五四

卅週年紀念專輯

「五四」卅週年紀念

專輯編委會編

“五四”卅週年紀念專輯

“五四”卅週年紀念專輯

編者　「五四」卅週年紀念專輯編委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1—3,000 (P)

目錄

毛澤東同志論「五四」運動

編者按：「五四」運動到現在三十週年了，我們怎樣認識這個運動的性質，估價其歷史意義和影響，今後如何承繼並發揚「五四」運動中的光榮傳統，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最後的與澈底的勝利，——所有這些，在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關於「五四」運動的言論中都有過英明的指示。爲了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特將這些言論彙集發表，以供學習、研究。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

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

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與北伐戰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

…………………………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而有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這時，中國無

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與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澈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與「五四」以後，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與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着這種性質。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餘毒在內）。以嚴復輸入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亞丹斯密斯的古典經濟學，穆勒的形式邏輯與法國啓蒙學者孟德斯鳩的社會論爲代表，加上那時的自然科學，是「五四」以前所謂新學的統治思想。在當時，這種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

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與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與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掩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勞動運動的眞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與殖民地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這種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是非常之顯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與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

開了自己的陣勢，向着帝國主義文化與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戰鬥，一般的暫時還讓自然科學爲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所統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在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時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領域，却引起了極大的革命，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

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新民主主義論」

「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强

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的統治階級及其幫閒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

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很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義向「左」翼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

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麼，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爲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的嗎？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麼，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啓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眞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對於這些東西的摧毀廓清，也就達不到目的。

——「反對黨八股」

「五四」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道路

陳伯達

一

「五四」運動已經經過了三十年。這是中國人民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成果，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爲偉大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由此就出現了以毛澤東思想爲集中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大變化的樞紐。這是中國人民由數千年被統治地位，而經過三十年的奮鬥、逐步與完全取得統治地位的樞紐。中國人民今天震撼全世界的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正是從此出發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也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民運動，人民英雄。鴉片戰爭中的平英團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以及這些運動中許多領導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前進，鼓吹了人民的覺醒，但是缺乏了近代的工人運動爲全體人民的前驅，而從貴族中與資產階級中出來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在戊戌變法時宣稱變法必須流血的譚嗣同，不論是辛亥革命前夜許多向反動官僚軍閥抛炸彈的好漢，他們也不能與民衆深相結合，不能確切領會人民的利益。這樣就顯出運動與領導人物很大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中國人民因此就不可能在這樣的歷史圈內最後戰勝敵人並把自己變成中國的主人翁。

「五四」運動變更了這種舊歷史的情況。在世界上那時已出現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在中國則出現了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角逐的歷史舞台，在這以後，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界開始了極大的分裂。以胡適這一類人爲代表的右翼，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很快地轉到反革命的方面，爲反動派

與帝國主義辯護，公開認爲共產黨人所指出的帝國主義支配中國的事實不過是「海外奇談」，並提出了「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以對抗當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潮。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與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新民主主義論）另方面，以毛澤東、李大釗等同志爲代表的左翼，則高舉革命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號召人民革命，以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及準備社會主義的將來，並投身於實際的工人運動中，結果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鍛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與人民在一起的鋼鐵般與胆大包天的英雄人物。

這個中國新時代，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於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特點，就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人民大衆的革命。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革命在人民中是缺乏明確的目標與正確的道路的。資產階級害怕人民大衆，並爲自己階級的歷史狹隘性所限制，因此，即使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中的最好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指出中國社會歷史的規

律與革命的規律。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打破過去革命的限制性與狹隘性，並懂得與根據中國社會歷史的規律與革命的規律，提供了中國新生的完全的希望與具體的道路。這種無產階級的領導乃是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集中表現出來，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形成，則是以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其前提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社會革命論在中國的出現，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引起了中國思想領域上的極大的革命，成為中國大革命的先導。這個思想大革命是代表工人階級的自覺，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革命；但是，工人階級開始獲得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卻是得到了那些走向工人階級而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幫助的，卻是那些先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工人階級中傳播這種學說的影響與結果，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在這樣一羣革命知識分子中最傑出與最偉大的人物。

知識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再由此出發，以工人階級代表的資格，而與農民運動相結合，這樣，就又幫助了中國農民運動脫離了原始的宗法的運動形態，而以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嶄新運動形態出現。

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而又與農民大衆相結合，同時也就使知識分子本身獲得了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沒有得到過的力量，改造了自己，顯出了巨大的智慧。在長期殘酷的與曲折的革命鬥爭中，雖然有一部分人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實行卑鄙下流的叛變，例如「五四」運動中以編輯「新青年」雜誌而著名的陳獨秀，在一九二七年就發展了對於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並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血洗革命之後，叛變了革命的陣營，變成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當了法西斯的走狗。又例如曾經在革命隊伍中混過若干日子的張國燾，在另一個歷史關頭，竟走入國民黨的特務集團，進行卑鄙的反革命工作。如此等等。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在艱苦的日子動搖起來，脫離人民，繞了一個大彎子，找不到可走的道路，而又重新回到人民方面來的。但是大多數革命知識分子是經得起考驗

的，他們在極端苦難的鬥爭條件下，跟着毛澤東同志一道前進，堅持了人民的旗幟，抱着戰勝敵人的決心，毫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他們的奮鬥成爲整個人民勝利事業所不可分開的重要一部分。同時，又有許多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長期中堅持擁護人民的正義事業，同樣地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光榮。

三十年來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的用盡氣力與犧牲生命，其所得的代價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可以不算誇大地說：他們在三十年中的成就，就其幫助人民革命勝利這一點上來說，超越了過去中國知識界千百年的成就。

毛澤東同志在「五四」運動二十週年的時候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結合工農民衆，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三十年來的歷史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唯一正確的論斷。

毛澤東同志在另一個地方對我們黨的同志又說到另一方面：「黨應保護革命知識分子。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的。」「一定要吸引和收容大批革命

知識分子。要說服工農幹部，吃得下，不怕他們；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三十年來的歷史同樣地完全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一個正確的論斷。

二

我們現在正臨着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就是說：一個破壞舊中國的階段很快地即將過去，一個建設新中國的階段正在到來。毛澤東同志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歷史課題：就是：「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給全國一切願意與可能爲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展開了更廣闊的道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也因此，原來已經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對過去的工作自滿，而需

要在這個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中負起更重大的責任，執行毛澤東同志對我們全黨同志所作的誥誡：「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而避免在新的歷史階段變成落伍的人。同時，我們人民革命的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前途，就使得那一切在過去還沒有參加革命行列的全國知識分子，得到了一個空前沒有的報効人民和改造自己的一切可能機會。很多人雖然過去沒有與工農大衆結合，沒有參加過去一個歷史階段的革命工作，但是現在大家還是可能而且必須與工農大衆結合，參加新的一個歷史階段即建設新中國的工作。現在大家來參加即將到來的準備把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生產大革命，參加全國即將到來的準備把文化落後變成文化先進的文化大革命，爲時是並不晚的。大家必須知道：如果沒有今天人民革命的勝利，要在中國實現這種工業化的生產大革命與普遍啓發民智的文化大革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九四五年四月間，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會作了以下的歷史總結：

「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强，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爲可以所學爲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强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之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强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經過了四個整年，在全中國境內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正將很快地完全實現。這也就是說，全國那一切希望自己祖國有偉大將來的知識分子們，現在是完全獲得一個自己的「英雄用武之地」了。大家重新和工農相結合，重新和一切人民大衆相結合，以建設一個偉大新中國 這個新的歷史使命正臨在全國知識分子們的身上。

三

但是，馬克思說得好：「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全國知識分子們要爲人民服務，就必須去獲得爲人民服務的意識，並繼續在實際工作中獲得教育。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著作中已說到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爲中國人民服務」。

在前一個歷史階段，工農運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思想領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進了許多知識分子相繼走進了爲人民服務的行列；在今後新的歷史階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識分子，而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正在促進全國知識界一個爲人民服務的空前新高潮；和這種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舊知識界又來一個關於宇宙觀與人生觀的思想大革命。知識分子們必須根據百年來——特別是三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的實際經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用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新觀點，新方法，在

一切學術部門（不論是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文藝的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去對自己來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有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曾經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末流若干反動的哲學流派，如胡適搬運美國資產階級御用哲學的所謂「實驗主義」以及張君勱或其他人們所介紹的所謂「柏格森哲學」、「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馬赫主義」等等。這些反動的神秘主義的唯心論的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流派，曾經利用中國的文化落後，胡混過一些日子，以對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他們用這類反動的觀點，反動的方法，始終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近代社會與文化問題。他們中間的最反動分子，例如胡適與張君勱，只能爲反動派與帝國主義辯護。現在事情很明白：所有這些反動的哲學流派，在中國人民面前是完全破產了。經過二十年來中國人民的鬥爭及其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已更加被證明是不可抵抗的眞理，而誰不願意落後，誰就須要認眞地去學習它。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

點與方法，這種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與方法，完全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是完全能够學得到的，只要他肯與工農羣衆相結合，只要他有爲人民服務的熱情，只要他不堅持過去的錯誤成見，只要一個人有那種爲着眞理而敢於向自己挑戰、敢於否定過去錯誤觀點的勇敢。

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我們向全國舊知識界號召接受三十年來革命知識分子光榮的傳統，進行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而把工人階級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來重新武裝起自己的頭腦。經過這樣一個思想大革命，並經過在實踐中的新考驗，舊知識界也就可以變爲人民的新知識界，而當他們能够從工人階級出發，從人民出發，去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觀點新方法的時候，他們的有用知識就能够在人民中發出極大的光輝，他們在爲人民服務的過程中，就能够眞正有效地與進一步地獲得偉大的結果。

紀念「五四」三十週年應有的認識

吳玉章

今年紀念「五四」的特點，是人民解放軍獲得偉大勝利，南京已經解放，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已宣告滅亡，革命很快就要得到全國範圍的勝利。

這一革命的勝利是什麼東西的勝利呢？

我認為是馬列主義的勝利。

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我們如果以冷靜的頭腦、遠大的眼光來透視這三十年事變的經過，就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兩條不同的路線在發展着、鬥爭着。到現在：一個是成功了；一個是失敗了。這是合於歷史發展的規律的。這兩條路線各有它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因為在當時它們都是新時代和中國新興階級的產物，表面上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因而使人難於辨

別是非、認識它們的好壞。其實這兩條路線，一個是革命的，一個是改良主義的；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一個是馬列主義的，一個是實驗主義的。宣傳馬列主義最早最有力的人是李大釗同志；宣傳杜威實驗主義最早最有力的是胡適。因爲當時美國乘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雙方都精疲力竭的時候，加入英法協約國的方面，因而英法美就僥倖得到了勝利，於是什麼公理戰勝强權啦！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啦！威爾遜的十四條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啦！叫得特別響。這時美國成了世界第一個强盛的國家，胡適從美國帶回的實驗主義就特別受到歡迎，成了最時髦的東西，胡適的風頭出得很足。因此，一般人都以爲「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胡適等領導的，其實胡適等不僅不是新文化的領導者，也不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恰恰相反，他們是反對者。眞正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是李大釗同志。而且他和胡適作了不調和的鬥爭。請看下面的事實吧：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勝利後不到一年，德奧無產階級起來推翻他們的反動政府，英法美得因此獲得勝利，中國也在名義上參戰，參加了英法

美等協約國，沒有出過一個兵，却借了許多參戰外債來武裝了反人民反革命的軍閥，但因爲協約國勝利了，中國也附帶成了「勝利國」。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釗同志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上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二文，在一般人喧嚷「慶祝勝利」的時候，大釗同志嘲笑他們的無知和盲目的慶祝，明白指出新世界必是「庶民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勝利。一九一九年五月大釗同志又發表「我之馬克思主義觀」。胡適起來反對，七月他在「每週評論」上作了「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來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大釗同志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來駁斥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變動」，研究問題不能離開方法，缺了主義。十二月胡適又發表「新思潮的意義」，反對馬克思主義，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反對社會的根本改造，反對革命。關於「五四」運動胡適也曾有過反對的文章，這都是事實。

「五四」時代，由於美國的强盜，胡適等請杜威到中國作實驗主義的宣傳，

共氣燄不可一世。當時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也正是欣欣向榮的時候。至於中國的無產階級雖同時有很大的發展，但還很幼稚，還沒有組織起來。以人口比例來說還少得可憐。而當時的蘇維埃俄羅斯，又為世界各國政府（中國政府也在內）所痛恨，更不許馬列主義的宣傳發展，然而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下面一個眞理，就是：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聯共黨史」四章二節）

這就是說：

「不要指靠社會裏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會裏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優勢的力量。」（同上）

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指靠於無產階級，而中國新文化發展的方向，

不應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而應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到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它是以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的理論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一九二五——二七的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戰爭，領導了一九二七——三七的第二次大革命——土地革命，領導了一九三七——四五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現在的第三次大革命——人民解放戰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弄錯。到了今天，事實證明，中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爲頭等歷史的和政治的力量。

因此，我們應該說，中國革命今天的勝利是革命路線的勝利，是馬列主義的勝利。

至於改良主義的路線，最初它是代表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它也反帝反封建。但是它：一方面實驗主義是從美國帶來的理論，崇拜美國，也因美國的變化而變化。美國在大戰後有一個時期的繁榮，因而有「美國的經濟是新式的資本主義，是永遠健康的，不必革命就可以和平轉入社會主義的」，各種各樣反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逐漸發展成了世界帝國主義最反動的堡壘，中國的改良主義者也隨美帝國主義而趨於反動；一方面，因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美國培植的附庸——封建買辦階級，因利乘便，成了中國的壟斷的大資產階級。最初代表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因爲親美的關係，本身的腐化，已經不是代表反帝反封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代表美國的走狗中國封建買辦大資產階級。今天的胡適成了賣國賊蔣介石的幫兇是不足怪的。

改良主義者常常是以自由主義、中間路線相標榜，自以爲他們是超階級的，站在階級鬥爭之外、站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其實在階級社會裏，沒有無階級的中間立場，所謂「中間立場」，在階級鬥爭尖銳時，一定會落到反革命的立場，這是有這樣思想的人應當深深警惕的。

人民革命的信砲——「五四」運動

黃炎培

遙遙的世宙，在幾千萬年進化途程中，經過長時期的漸變，來一個突變，突變的程序，有時會分做若干階段，最後才到達了成功。

中國人民革命，經中國共產黨領導，到今天走上了成功的途徑。它的運動，不始於今天，民十六國民革命軍北伐，也曾一度表現它的力量，最早乃是「五四」運動。它首先把人民的力量，用突變的方式表現出來。到今天才在完成突變的程序，而人民革命工作，恰等於農家經過春耕夏耘而秋收希望它的使命從此完成。

用突變的方式，發揮人民力量，這是「五四」運動所負荷的使命的本質。而打倒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乃是當時軍閥送給它的好題目。例如民十五，上海英租界巡捕開槍制止學生遊行，有了這個好題目，便有「五卅」事件發生，一五

四」和「五卅」，兩者範圍大小不同，而性質略同，而「五四」實是人民革命歷史發展初期的一個信砲，恰等於黃花岡一役是辛亥民族革命過程中間的一個信砲。

爲了「五四」運動，屬於人民革命發動的最初期，所以那一回運動的成員特別複雜。極少數是把人民革命做目的來領導運動的，也有並沒有了解人民革命意義，僅發於愛國的一念，來參加運動的。中間最大多數，等於戲場裏的跑龍套，儘管寫出激昂慷慨的文章，儘管擎着白旂，喊着口號，跟着人家跑，當時很像是前進分子，情勢一變，緊要關頭到了，他們會幹出反動行爲。人民革命運動成功期的革命對象，不少「五四」時期轟轟烈烈的人物，就是這個緣故。

歲寒知松柏，有了百卉的凋零，越顯出松柏的珍貴，我們今天站在人民革命完成時期，來紀念「五四」，要紀念當時的運動領導者，還應該認清人民革命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用新民主主義來領導人民革命，何以會成功？何以成功得這樣迅速，澈底？他們用怎樣方法來領導人民的？革命成功後，人民所得到的是什麼？這都是需要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認識清楚了，我們每一個人要誠心誠意地做這

回運動中間一個成員，不光是跟着人家跑，「五四」運動，就是給予我們一面很好的鏡子。

——民國三十八年五月

急起直追參加革命建設工作

施文瀾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眞正光榮，眞正偉大，眞正劃時代的一次大運動。從這運動開始，中國人民昂然站立起來，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猛烈作戰，把那堆積如山的臭穢物逐漸掃除出去，使歷史變成人民自己的歷史，舊中國變成人民自己的新中國。

誰發起這個運動的呢？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但是，只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六三」運動中，便和廣大的無產階級結合成一體，一九二一年便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從有了共產黨，中國人民才得到正確、英明、勇敢、機敏的領導者，才能夠用自己的力量打倒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枷鎖。「五四」運動之所以光榮、偉大、劃時

代，正因爲這個運動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共產黨則是領導全國人民洗去垢辱，消滅强暴，創造新天地，完成「五四」所提任務的無產階級政黨。不言而喻，「五四」運動的光榮、偉大、劃時代是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所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除去投入無產階級陣營的一部分）動搖、消極、悲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敵人妥協，站到反動方面去，如果他們在「五四」運動中也曾有光彩的話，那只能說，或多或少的光彩是有過的，可惜不久；有的就失去了光彩，有的背叛「五四」，變爲可恥的反動知識分子了。

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與中國工人農民站在一起，在中國共產黨，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現，前仆後繼地戰鬥了三十年，現在即將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爲什麼他們的知識會變成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沒有別的，只是他們學習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把頭腦武裝起來，從這個頭腦裏所發出的知識，才能爲人民服務，才能爲人民所歡迎，才能產生力量。有人這樣想，我

的知識很玄遠，很深奧，管他什麼馬列主義，什麼毛澤東思想，什麼辯證法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我自有我無用之用，不朽的價值。是的，你是有這樣想的自由的。但是人民也有不歡迎的自由。在人民的世界裏，不爲人民所歡迎的知識那就是無用的知識，只有速朽而不能不朽。

我在「五四」運動前後，硬抱着幾本經書、漢書、說文、文選，誦習師說，孜孜不倦，自以爲這是學術正統，文學嫡傳，看不起那時流行的白話文、新學說，把自己拋棄在大時代之外。後來才知道錯了！錯了！劍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感謝時代不拋棄任何一個願意前進的人，我算是跟上時代了。想起那時候耳不聞雷霆之聲，目不覩泰山之形，自安於蚯蚓竅裏的微吟，如何不後悔呢！

今天，轟轟烈烈的革命勝利，其顯而易見易聞，比雷霆泰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大量知識分子傾向或湧入革命陣營，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可是還有一部分人捨不得舊有的一套，不願意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有的自嫌遲暮，懶得再下功夫去改造。這兩種想法都是不對的，新中國偉大的建設工作——經濟

的、政治的、文化的、軍事的——正在開始，祇要參加這個工作總是早而不算遲的，關鍵在於立場觀點方法的改變是否早而不遲。如果願意改就有改的機會，但遲到不祿而還沒有改那就算是遲了。

我也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經過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願意和我的同伴們共同努力，攀着時代的輪子，永遠前進。我們要在革命建設工作的實際行動中證明我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還須準備長期而堅決的鬥爭

——爲「五四」三十週年紀念作

茅盾

「五四」運動是思想運動，也是羣衆運動。當然又是政治運動。從思想方面看、那時成爲主潮的，是反封建（反禮教）、主張個性解放。而作爲一個既發之後即澎薄全國的羣衆運動，那時的主力不能不說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至于「五四」的政治口號，如所周知，就是反帝反封建和解放被壓迫階級，雖然這最後一個在當時還不大明確。

「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在思想分野上，主要也分爲兩派，一派是馬克思主義者，幾天以前紀念過的二十二年前殉難的李守常先生就是一個卓越的代表。又一派，勉强可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當時，他們還保持了自由主義者的面

目）。現在已經墮落到無聊而又無恥的美蔣走狗，戰犯胡適，便是一個最為典型的代表。在那時候，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想，其聲勢，其羣衆，都勝過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然而，三十年來，在思想運動方面，充實了「五四」的思想內容，加强其戰鬥性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而是工人階級的馬列主義；三十年來，在每一民族危機時期，指示了民族解放的歷史方向，堅決而正確地領導人民前進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而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馬列主義的政黨。今年是「五四」的三十週年，在這「紅五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從此結束，震撼了全世界的一個新中國已經產生，「五四」的歷史任務也終于完成了，難道這樣鐵一般的事實還不够證明何者是眞理所在，方興未艾，而何者則是違背歷史法則，命定要沒落的麼？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五四」初期曾一度表示其興奮而思振作。然而先天不足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既富于妥協性，對勞苦大衆的要求解放則又畏如蛇蝎，於是在一度興奮以後，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威脅利誘下，立即就右傾

了，乃至反動了，其中一部分終于倒入封建地主買辦階級的懷抱，投靠在帝國主義的門下。此在文化方面的表現，就是自由主義者的搖擺不定與其中一部分人的終于墮落。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不必再舉。如果在「五四」初期，當自由主義者還沒收起反封建的旗幟而且至少也還不敢公然爲帝國主義辯護的時候，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對于自由主義尚存幻想，那麼，在這時候，他們若不是感到了幻滅而苦悶，那就毅然走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面來了。這也是我們親眼看見或親身所經歷的，也不必再舉例子罷。這一時期，馬列主義在中國，尙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革命運動犯過錯誤，有過挫折。苦悶的知識青年羣有過短時期的思想混亂。小資產階級青年以頹廢爲逋逃藪，在亭子間裏和女朋友一面拚酒，一面舉拳擊桌，歇斯底里地喊着：「到民間去！到民間去！」爲個人無政府主義所陶醉的破落戶子弟，穿着褪色的綵衣，揮霍完了他太太的最後一文陪嫁和私蓄，「熱情」而憤激地大呼：「一切都毀滅了罷！一切都毀滅了以後，烏托邦就出現了！」玄學鬼，夜遊病患者，躲在十字街頭的象牙塔內的「藝術至上主義者」，

未來派，世紀末的憂悒病，復古派、全盤歐化論、等等、一齊同時登場。然而所有這一切的思想混亂，在馬列主義的光耀之下，終于逐漸獲得澄清：這不也是大家都經歷過，好像僅是昨天發生的事麼？

從達爾文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易卜生到高爾基，從「實驗主義」到辯證法，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從無條件地搬演歐洲近代的文藝形式到提出民族形式這一課題——三十年來，這道路是迂迴曲折的，但卻不是循環往復而是步步前進，步步在作兩條戰線的鬥爭。到今天，「三十年爲一世」，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思想，正如已在政治軍事上取得偉大的勝利一樣，在文化戰線上也已得到了决定性的勝利了。

然而我們還不能說，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敵人已經全部繳械，全部肅清。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敵人有帝國主義文化，有封建文化，還有買辦文化。在「五四」三十週年這一天，南中國的最大文化中心，上海，或許已經解放，至少亦已臨到解放的前夜，三十年來，上海是立於文化戰線的前哨地位，鬥

爭最爲激烈的，而上海一向又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買辦文化的「共存共榮圈」，共頑強性恐爲全國冠，上海的解放並不意味着這三種反動文化的消滅，正如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我們還不能說反動勢力就此即將銷聲匿跡。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的餘孽在全國各處都還潛伏着，我們還須作長期而艱苦的鬥爭。

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並不是說我們連帝國主義各國的具有建設性的學術思想，古典文藝以及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文藝都一概排斥了。我們所反對而必須在我們的文化思想領域中掃除掉的，乃是作爲帝國主義侵略先遣隊而在中國人民精神上起腐蝕作用與麻痺作用的東西，如歐美資產階級末落期的個人主義，頹廢思想，文藝上的一切所謂「近代派」，特別是在「美國主義」這塊招牌下面所傾銷的什麼美國式的民主，美國式的自由生活方式以及美國作風的市儈文藝，市儈哲學。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把美式裝備送來，解放軍已經笑納了，但是和美式裝備同來或先來的佈滿了全中國的「美國主義」商標的東西，不論它裝潢得怎樣美

麗，我們文化戰線上的戰士們却一定要把它澈底掃除，送還原主。我們不需要「美國主義」的民主和「自由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市儈哲學和炫耀大腿乳峯的色情文藝。

同樣地，我們說要堅決消滅封建文化，並不就是說要把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加辨別地統統束之高閣。相反的，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的遺產我們要繼承，還要發展它。這一層道理，現在差不多已成爲常識，這裏不必再多加以說明了。封建文化的籐蔓可說是到處全是，糾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斬除這些籐蔓，恐怕要比土地改革還要費力，需要的時間恐怕也還要多些。

買辦文化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文化的乾兒子，依大城市爲據點而伸長其觸角。小資產階層是買辦文化最易蔓生的溫床。崇拜洋人，醉心歐美生活，「月亮也是外國的亮些」，——總而言之一句話，在人民中間散播民族自卑心理，就是買辦文化的特長。尤其惡劣的，是專揀中國的一些封建性的頹風敝俗，用販買假古董的姿態，寫成書本子，在博得洋主子一笑之餘，賺幾個賞錢，以自滿足其物質

慾。林語堂就是這一類買辦文化製造者的典型的例子。中國人民是偉大而英勇的。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中湧現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勳功偉烈，在全世界上現在還唯有蘇聯的人民也在衞國戰爭中一樣地表現過。我們要歌頌人民的英烈，發揚民族自尊心，把買辦文化和買辦階級一齊在中國大地上消滅掉！

革命在全國勝利已是計日可待的了。然而正像在全國範圍內掃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餘孽尚需要我們繼續努力一樣，在全國範圍內掃除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和買辦文化所需要的時間和努力，也許還要多些罷？我相信我們是能夠把這三位一體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敵人掃除掉的！因為我們這支文化隊伍是有三十年的鬥爭經驗的，我們已不像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時既然缺少經驗，而且陣營不整；現在我們不但知道怎樣戰勝敵人，也知道怎樣團結友軍。但是為要保證成功，我們必須繼續學習，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些，用人類最進步的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頭腦。

四月三十日

從源頭到洪流

——紀念「五四」三十年

胡風

一九一三年，革命的山鷹列寧，他指着亞洲向全世界的，特別是歐洲的無產階級發出了洪鐘一樣的指示的聲音。

他指出，在歐洲先進而亞洲落後這常識的眞理以外，須要進一步看出來歐洲是落後的而亞洲是先進的這一「含有苦味的眞理」。

一方面——

「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周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已進到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此時統治的資產階級因害怕增長强固起來的無產階級，而維持一切落後的、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歐洲現時之所以先進，並不是因爲有資產階級，而是違反着資

產階級的意志，因爲只有無產階級才使爭取幸福將來的百萬大軍日益增長起來，只有它才保持着無情地仇恨落後，仇恨野蠻，仇恨特權，仇恨奴隸制，仇恨人侮辱人現象的心理，並傳佈着這種心理。」

而亞洲呢？——

「亞洲各處都有强大的民主運動增長，擴大，鞏固起來。那裏的資產階級還同人民一塊反對反動勢力。數萬萬人覺醒起來，趨向於光明和自由。這個世界運動該使所有一切知道民主制度是達到集體制度所必經之路的覺悟工人多麼歡喜啊。一切忠誠的民主主義者是對年輕的亞洲多麼表示同情啊！

「而『先進的』歐洲呢？它掠奪中國，幫助中國民主自由底敵人！……

「整個歐洲當權勢力，整個歐洲資產階級，都是與中國所有一切中世紀反動勢力實行聯盟的。」

五年以後，在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領導着農民摧毀了沙皇的奴役制度，那個震撼了全世界的大革命的第二年，一九一八，革命的思潮驚醒了中國人民底潛在要求，民族民主運動抖掉了一直在那裏面苦悶着的科、工、商、賈、立憲、議會、

法統等等虛偽的「民主主義」的濃霧，封建主義的舊中國從內部深處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驚喜和前所未有的痛楚。中國人民底第一聲衝鋒號，「狂人日記」發表了。那是對於封建主義舊中國的血淋淋的戰書，向封建主義舊中國表示了不能兩立的決死的挑戰態度。對過去和現在，它提出了「人吃人」的控告，對現在和將來，它發佈了「救救孩子」的命令。在同一年，魯迅還發表了十六篇雜文，那每一篇都是對於封建主義的無情的刺殺和對於勞動人民的深情的激勵。

就這樣，思想戰線上的人民革命派開始了躍進的突擊。而思想，當它是成熟了的歷史要求底真誠的反映的時候，就能够飛快地發展爲物質力量。到第二年，英勇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是這躍進的突擊所創造出來的，震撼了全中國的第一次大會戰，它不但使思想革命的洪流洶湧澎湃地發展了開去，它還使這個洪流底千萬支流匯合到反帝反封建這兩個綜合的目標上面。這是一個偉大的向社會革命突進的思想革命，魯迅本人後來就曾經指斥過改良主義者們「美其名」地把它叫做「新文化運動」。

今天回頭看一看，當時的革命思想，連「勞動神聖」這口號也包括在內，在它所要爭取的社會實踐上說，都是在資產階級性的要求以內的，但在它底內在的來源上，却深刻地接受了俄羅斯革命底號召，是以勞動人民爲本位的。

魯迅本人當時明白地宣佈過，俄羅斯革命是「新世紀的曙光」，他號召中國人民向這個曙光「抬起頭」來。

而另一個英勇的突擊兵李大釗，也明白地宣佈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目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所以，人民革命派的思想革命，在一開始的當時，就不但立場堅定，而且旗幟鮮明。因而，最初是一面團結一面抵抗着民主改良派，後來是間或團結但却經常揭發改良派底虛僞性、妥協性、以至反動性而爭取前進的。

不用說，當時的思想革命以至社會鬥爭，是由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所担當的。他們最初地接來了火種，馬上就把自己燃燒了起來。然而，第一，這思想革命原來是勞動人民底潛在要求底反映，第二，這革命的思想接着就深入了

勞動人民裏面，化成了實踐的戰鬥主力。到一九二一年，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同時又是廣大的被壓迫人民底參謀總部的中國共產黨，正式結成了。

三十年以來，人民革命的鬥爭經過了許多次雄壯而驚險的波瀾。就革命的知識分子說，他們所輸入的火種馬上在勞動人民中間燒起了革命鬥爭的烈焰，這烈焰又反轉來燃燒着知識分子自己，使他們不斷地受着考驗。三十年以來，艱苦而火熱的實踐的革命鬥爭，同時又正是一個思想鬥爭和思想發展的過程。思想的火種，投進了現實社會、化成了鬥爭的烈焰以後，這時候，被叫做思想的，不但得具有獻身的高度堅貞性、而且還得把彼此息息相關，時時新陳演變的全部歷史現實和鬥爭內容化為自己的血肉，從這裏就出現了無比豐富也無比艱苦的，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實際過程。三十年以來，在這個過程上面呈現了形形色色的變化。有的剛剛想踏進脚來就廢然而返，回到了封建的故園或買辦的寫字間裏面，有的戰不數合就跪着把戰友底頭顱向敵人呈繳上去，有的學會了一套祖傳的「做戲的虛無黨」的本領，忘記了獻身的鬥爭和賺錢的生意是絕對相反的兩回事，有的滿懷

自信，但只是閉起眼睛揮舞着板斧，傷害了人民也跌倒了自己，使革命史上原來已經够多，現在更加多出了血淚斑斑的紀事……。然而，革命鬥爭在堅持，在前進，勞動人民在覺醒，在成長；思想，它一定要保持那獻身的高度堅貞性，它一定要把彼此息息相關，時時新陳演變的全部歷史現實和鬥爭內容化爲自己的血肉，無比豐富的社會實際和無比生動的革命經驗一定要結晶；果然，十多年以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驚喜地發現了：毛澤東思想達到了具體的形成，爭到了相對的優勢，以至奔向着壓倒的勝利。

思想底勝利由實踐鬥爭而來，但它反過來就强有力地指導了實踐鬥爭，促進了實踐鬥爭，終於保證了實踐鬥爭底勝利。今天，在全國的規模上，已經得到了壓倒的勝利，馬上就要得到完全的勝利。革命擊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層統治機構，擊退着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實行聯盟」了近百年的攻勢。

當然，現在還只是打破了統治的政治機構，還只是初步地或部分地開始了經濟改造的過程，然而，在這個勝利以後，而且只有在這個勝利以後，才能够全部

地實行經濟改造，深入地進行文化革命，使無數的優秀的兒女和四萬萬以上的勞動人民獻出汗或者還要獻出血來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幸福而平等的人民的祖國。

在這樣的今天，我們再回頭看一看這革命洪流底最初的源頭，那是多麼美麗，多麼使人感動！

三十六年以前，全世界勞動人民底偉大的先驅者列寧已經向我們提出了保證——

「……整個年輕的亞洲，即亞洲數萬萬勞動者，却有各文明國家裏的無產階級爲其可靠的同盟軍，世界上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這個無產階級把歐洲各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一同解放出來的勝利。」

三十一年以前，「五四」的前一年，中國人民底偉大的先驅者魯迅，替那第一個戰鬥年度作了總結，用那三十年以來的血的鬥爭提出了保證——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着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麼都阻止他不

得。

「自然賦與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什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

「以前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先驅者們底號聲一直響到了今天，先驅者們底歌聲一直響到了今天，對於今天的我們，更加感到了那無比雄壯的精神力量。

今天的青年們是幸福的。這幸福，不僅僅是因爲革命勝利了，再不會忍受三十年以來的無數的先驅的青年們底悲痛的遭遇。這幸福，特別是因爲偉大的革命思想從封鎖、歪曲、侮蔑、壓殺等等裏面高昇了起來，普照在這人民的土地上面，能够毫無阻礙地去正視它、接受它、吸收它、幫助自己愉快地解除過去汚重的負

担，把住方向投身到人民底戰列裏面。今天的青年們是幸福的，雖然不但在擺脫過去而且特別在走向將來的路程上還不免要遭到困難，遭到委屈，遭到挫折，須得用大力去忍受，去通過；然而，比較過去三十年以來的無數無數的先驅的青年們，他們在思想上所受到的委屈，所經驗的困難和痛苦，所付出的犧牲，那却是幸福的，過於幸福的了。今天的青年們會寶貴這個幸福，使自己更美麗，更智慧，也更堅强，使自己成爲我們祖國底無數無數的優秀兒女裏面的一員，付出力，付出汗，甚至要付出血來參加到偉大的但却得通過長期的艱巨過程的改造祖國的歷史工程裏面。

——一九四九、五月三日、急就、在北平

「五四」與馬列主義的勝利

沈志遠

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五四」運動，到今天已經滿三十週年了。沒有人能夠否認，這是震撼世界的一次偉大的東方民族覺醒的革命運動。它之所以是劃時代的，因爲它是近百餘年來中國民主革命從舊範疇過渡到新範疇的歷史轉折點，同時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的開端。

今天我們舉行「五四」三十週年紀念的最偉大的意義，就在由這個劃時代的「五四」運動開了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在已隨着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滅亡而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這一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不久就要實現，那是毫無疑義的了。

這一革命的勝利，從文化思想的意義來講，本質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形

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文化思想和封建半封建文化思想的勝利，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統治中國二十二年的蔣介石匪幫的殺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今天革命的人民解放軍在摧毀反革命武力的鬥爭中所以能够所向無敵，乃因這一軍隊是由毛澤東旗幟下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緣故。而中國共產黨所以能領導人民解放軍所向無敵地走到最後勝利，乃因這個黨武裝着一件所向無敵的武器，這件武器比反動派的飛機大砲坦克還要强過千百倍，這武器就是革命的馬列主義。毛澤東的旗幟，也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的旗幟。

正如政治上新民主主義革命係由「五四」開其端一樣，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也是由「五四」啓其序幕的。所以毛主席說：「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

但是由「五四」啓其序幕的中國的新文化，以它的內容性質言固是新民主主義的，以它的實質言，却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這是怎麼說呢？這意思就是

說：「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種「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只能受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尤其是這種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依據馬列主義的立場、方法和精神，依靠馬列主義這一無敵的革命思想武器而建立起來，生長起來和節節走向勝利的。這種新文化的澈底勝利，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領導之下，並在向共產主義的大目標邁進中達到的。

不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本身，嚴格說來尙未完全受馬列主義的思想領導；當時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兩大旗號——「賽先生」和「德先生」，一般啓蒙戰士們也並未從馬列主義的立場，依據馬列主義的觀點去解釋，儘管打倒孔家店，推翻舊禮教，反對舊文學等英勇舉動，確實具有否定三千年來封建文化的偉大革命意義。這是因爲在當時反映新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新運動中，雖已開始有無產階級的參加，但無產階級究竟尙未在那次革命運動中起主導的作用，尤其是因爲當時無產階級的黨尙未正式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緣故。可是話雖如

此，由於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強烈影響，特別由於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強烈影響，馬列主義的文化思想運動，却在「五四」時期，甚至在「五四」以前，已經開始蓬勃滋長起來。民國六年以來成爲宣揚革命新文化的司令台的「新青年」雜誌和其他報刊如晨報、新中國雜誌等，曾經刊載過許多介紹和宣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論文，便是事實的明證。不錯，在當時被輸入進來的西歐新文化思潮中，除馬列主義外，還有如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各色各樣的唯心主義以及文學上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等，即馬列主義理論思想的介紹與宣揚，在今天看來，也是很多不完全正確的；這裏證明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想是何等的紛歧錯雜。然而這種紛歧錯雜的思想陣容，却是「五四」運動的歷史局限性所造成的。我們决不能因此而抹煞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替以後馬列主義文化思想的發展淸道的偉大歷史功績。

由於「五四」革命運動的勝利進軍（同時也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西歐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普遍高漲）、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就日益加速地提高起來，卒致建立了自己階級的政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同樣，由於「五四」革命新文化運動替以後馬列主義文化思想發展清道的歷史功績，更由於馬列主義文化思想與日益强大的工農革命運動相結合，馬列主義的文化思想才日益普遍地發展而逐漸變成中國文化思潮中的主流。今天以毛澤東思想為其結晶的中國的馬列主義之形成、發展與勝利，我們不能不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就上追溯其歷史的淵源。

然而以毛澤東思想爲結晶的中國的馬列主義的勝利，是經過了長期曲折的，具體地說，它是在與反民族反科學反人民大衆的各色各樣的反動思想的堅决鬥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的。

在「五四」以後的三十年間，在中國文化思想戰線上，相繼出現了「全盤西化論」的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盲目排外論的復古主義的封建文化思想。關於前者，發展到極緻時，變成了「月亮也是外國的好」論；關於後者，發展到極緻

時，變成了根本拒絕科學與民主，阿Q式地誇耀中國五千年文化的萬能與無所不有。

「全盤西化論」者不但住必洋房，食必洋餐，說必洋話，讀必洋書；大學校裏的教科書一律用英文原本，甚至連中國史和國文都有用英文或英語夾雜着來教了。這種以培養帝國主義走狗爲目的的文化教育，顯然是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文化教育。稍微「好」一點的是生吞活剝、毫無批判地把外國的文化學術，原封不動地搬運進來。這裏有實驗主義，有柏格森主義，有尼采哲學，有康德、黑格爾，也有馬克思、列寧。眞是洋洋大觀，懿歟盛哉！然而無視中國民族特點，無視中國現實的條件與歷史要求，而專事盲目搬運，這些外來的文化學術跟中國老百姓又有什麼關係呢？

與此完全相反，「五千年文化」的誇大狂者（復古主義者）則以誇耀羅盤、火藥等物的發明來拒絕對外國最新科學思想的吸收；以孟老夫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類「有道明君」的封建統治思想，來拒絕當前世界的人民民

主思潮。抗戰以前的「中國本位文化論」和卑劣無恥的「新生活運動」，都是最死硬的國民黨反動派藉以奴化老百姓，實現封建法西斯獨裁的復古主義的思想武器。

中國的馬列主義在「五四」以來的卅年間，跟這兩種反民族反科學反人民大衆的反動文化思潮，進行了堅決不撓的鬥爭，而且終於達到了勝利。以天才的毛澤東爲首的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實踐了爲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文化而鬥爭。他們主張中國的新文化應該是民族的，它必須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及維護中華民族獨立爲鵠的。然而他們同時主張「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爲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對於一切外來的文化，應當「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作爲自己的營養分，決不能生吞活剝的毫無批判的吸收。」」（「新民主主義論」）同時，中國的馬列主義者也實踐了爲反對封建迷信的科學文化而鬥爭。他們主張中國的新文化又應該是科學的，它必須堅決澈底地反對一切封建獨斷與盲目迷信，反對一切反動的復古主義思想。然而他們不否認中國有燦爛的古代文化，但是馬列主義者對古代文化的態度，是「剔除其封

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但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並蓄。」（同前）

一句話，「五四」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是在馬列主義思想反對全盤西化的帝國主義奴化思想和反對復古主義的封建思想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中，日益走上勝利之路的。

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最近十年來「學術中國化」口號的提出和實踐。毛澤東主席以天才思想的姿態，自己提出了這個體現馬列主義思想的偉大口號，同時自己又實踐了這個口號。實踐這個口號的具體表現就是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爲具體表現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

然而毛澤東思想不祇是中國獨有的馬列主義，它實是帝國主義沒落時期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馬列主義，是那些國家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惟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和思想旗幟。今天任何一個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所統治的民族，假如離開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學說，離開了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

理論與政策，離開了他關於人民革命戰爭的戰略與策略思想，離開了他關於建黨建國的理論與政策，離開了他關於文化思想的理論與政策，那末它們就會一事無成。只有毛澤東思想這種被壓迫民族自己的馬列主義，才能領導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人民走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勝利之路。

「五四」的歷史功績永垂不朽！

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故都

由「文化古都」轉變到文化新都

——紀念「五四」第三十週年的節日

夏康農

大家說慣了的「文化古都」的北平，從今開始了轉變成為文化新都的機運了，因為毛澤東的旗幟插上了這一座古都的城頭。

像這樣的一面旗幟插上了像這樣的一座都市的城頭，這是中國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大事，任你是神話式的巨人也休想拔它得動。這一座城市是必然隨着這一面旗幟逐時發展它的光輝燦爛的嶄新的前途的了，人們將很快地遺棄它的含義模糊的「文化古都」的稱號。要借用自然現象的比擬，這變化對於中國歷史的意義，正彷彿是地質史上的造山運動：一座像喜馬拉雅的大山既然冒出了地面，千萬年的些小地質變化休想更改它的面貌。

這說法也許近於神秘；要說樸素些，那就正因爲毛澤東的旗幟是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今天又到了人民世紀的五十年代。假如我們說，從前大家曾經掛在口邊的「相信人民的力量」的說法，不免只是意識的號召，多少流入空幻；那麼，今天這說法可就是活生生的事實了。

依據毛澤東的思想，「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可見今天北平轉變爲人民中國文化新都的機運，應當從「五四」這節日追憶它的第一陣號角聲音。而「五四」是產生在這「古都」裏面的一次大事；這是這個「古都」的光榮，這也正合成語所謂「枯楊生稊」的矛盾發展的道理。這節日到今天恰是第三十週年，我們的成語裏又有「三十年爲一世」的說法。迴溯這一世代的過程，人民中國的誕生，由萌發到抽條，中間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今後將是開花結實的歲月了。一世代的經驗指示我們，中國的改造，一定要由勞動人民作主導力量纔使條理分明，步調嚴整，眞正作得出一些有世界分量與歷史分量的事情；文化成就自

然也包含在內。是凡親身意識過這一世代的過程而今天還活着的中國人，今天該是感覺到多麼透澈肺腑的忻悅！難道今天這「古都」之內，還可能存在有懷疑什麼叫做「人民的力量」的人麼？果然，那就要請他搖撼搖撼他那僵化了的腦筋，首先體驗他今天的遭遇，再追尋這遭遇的由來；假使追尋不能太遠時，至少要推到三十年前的「五四」。

北平的得到和平解放，成爲全中國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中城市解放的模範方式之一。這個解放前後的過程，不只牽引着圍城以內，和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人們的關懷，而且時刻在敎育着一切關懷的人們，指示出極鮮明的文化交替的意義。我們只須回想起北平解放以前作爲象徵這座城市的統治勢力的一武一文（傅宜生將軍和胡適之博士），一位是華北封建勢力的殿軍，一位是畢生宣揚帝國主義文化的辯士，他們的歷史的道路都在此時此地走到了盡頭；而結果是封建代表人澈悟了歷史消息，轉頭趨向了人民，而帝國主義的辯士却自以爲奧援有托，不惜「遠走高飛」。我們只須默想這一幅變遷的圖畫，就不難體會到三十年來苦惱

了整個一世代人心的「反帝」「反封建」的浩大工程，這回是得到了多麼深厚的成就；而這個成就的豐功，除了沁透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集體人民，還有什麼階級担當得下？我們只要能够層次謹嚴的解答得出「爲什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的中樞機關能够安安穩穩地設置在東交民巷？」這一個問題，這裏面就是一整套的新興學問，也就是「文化古都」轉變到文化新都的最有力的開篇標題。

我以爲「文化古都」的人們最好要從這樣的文化意義上理解到北平之終於得到和平解放，要認淸盤據這座「古都」的舊有文化之腐朽沒落（大家只須回憶圍城時候舊有勢力憑藉這座「文化古都」的無賴精神，幾乎使它遭受到不可設想的破壞，在那時候的憤慨與焦急的情形就够了）與新興文化之康健淸新與厚重周密，這纔可以體會到這一種變化的來龍去脈，可以設想到文化新都的今後進程。反之假使犯了僥倖的幻覺，眞的以爲「文化古都」裏面的市民是特殊「高貴」，必然贏得人民解放軍的珍惜，那纔是可笑的錯誤。更假使因此而懈怠了自身的改造，那後果就不只是可笑的錯誤了。

中國人民在地獄性的折磨中奮起了新時代的大勇，十幾年的磨練已經誕生了廣大的一代新人，他們不知道罪惡，他們和虛僞、狡詐、懦怯、愚頑的一切惡德也都是陌生。他們從中國廣大的土地裏誕生，完成了多少所謂「先進國家」到今天還沒有作到的「土地改革」。他們秉着這一股先進的精神不斷地向高級提煉，自己付出了無比浩大的犧牲，却不惜用盡一切耐心與努力爭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們的英勇與智慧已經在廣大的土地上造成了對於古老北平的必勝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優勢，這纔舉重若輕，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功效。

然而這一切的規模，都只是爲了人民的「利益」；唯有人民的「利益」纔可以金聲玉振地高呼入雲，用不着談什麼「仁義」，雖然照舊意識的看法，人民解放軍眞可以算作「仁義之師」。這一點就是文化新都最應當紀錄的一條文化原則，也就是基本上解決了千古思想家們聚訟紛紜的唯物與唯心之爭的最響亮的答案。回想起「五四」時代反封建文化的熱潮，那不過只能是啓蒙性地鼓舞着一部分知識青年，缺少階級理論的充實；然而作爲「五四運動」來看，畢竟向封建古都投下

了一次强烈爆炸性的炸彈。「五四」運動之終於贏得了勝利，爲封建思想敲擊了喪鐘，對於發展到今天浩大規模，確乎存在着鮮明的聯絡的線索。祇是歷史的辯證發展，封建文化招來了帝國主義文化的撑腰；因之作爲籠罩在這一座城市的買辦意識，從此暗中和封建意識合流，壓迫着人民文化的發育。我們只須回憶魯迅先生的從這裏被逼出走，和胡適博士的在這裏聲譽日隆，就可以瞭解到文化戰鬥所反映的社會實質。這裏面不只說明了「存在決定意識」的課題，而且反映了激變的中國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盈虛消長的消息。唯有歷史唯物的思想不只說明了社會，而且由於這樣的思想武裝了物質的人，更有改造社會的能力。對比着是凡反對這種思想的思想，枉架空中樓閣，却自以爲或者超然物外，或者也算「改造社會」，那該是多麼蒼白與脆弱。這情形即使失掉了反動階級的憑藉，不必就能發生反動的實害；但是那一部分「超然」，又該是多麼可憫！確認「存在決定意識」的思想之踏實與艱難，對比着反面思想之虛幻與偷巧（即使不說反動實害的那一面），其實中國成語中「畫鬼容易畫虎難」的說法正從基本上一語道破。更何況意識到存

在的條件以後，還須提高一級進而追求存在的規律和它的歷史發展，然後再提高一級，從歷史與物質條件允許之下預見它的將來，這樣纔再說得上如何配合上主觀的努力，實現這樣的將來。

今天，中國人民的成就，是挾着一整套新興的思想體系附隨新興的社會存在以巨浪滔天之勢浸沒了「文化古都」了，習慣於「古都」的「文化」的人們，有的或者不免目眩心迷，一場興奮之餘多少感到悽惶與痲痹罷？再不然，或者不免順着舊時的慣性，漫不經心地自嘲自慰，輕巧一聲「不過如此」交代了新型文化的課題罷？但是只要一想到：這一切成就，主要地發源於農村，也正是大家似乎熟悉，習慣以爲卑不足道的農村，又正是今天使得那趨向沒落而却自以爲優越的帝國主義震驚失措的中國農村，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自從「文化古都」獲得解放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改換了性質，換作以城市領導農村；這些都是查遍了古今中外的典籍都找不出現成的方案的問題：只要一想到這些，所有自以爲熟悉城市生活的人們，就都想輕率判斷而不肯了。然而這正是由「文化古都」轉

變到文化新都的基本認識與重要內容，這擔子可就有不輕的成份落到城市的文化工作者的肩上了。

如果我們都能同意，文化並不等於歷史博物館，並不等於圖書館，也並不等於「輸廻教育式」的學校，而更重要的是創造，是由活生生的社會光明向上發展的迫切要求所湧出來的創造。那麼，今天不應該還朦朧含糊，拒絕承認一切創造的基石，尤在於物質財富的創造。從平易的一面說，固然是「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問題；可是一牽聯到文化的意義，却就是怎樣傾注全份聰明才智以及怎樣體會到熱情洋溢催促着傾注全份聰明才智的問題。現代肌肉神經生理的實驗，指陳出不同的神經興奮條件之下，肌肉的工作反應自然會不同；而神經興奮的强度，却又決定於環境刺激的性質與强度。所以，這也就是怎樣甘心接受新變化的刺激，發揮最高强度的興奮的問題。假使要模倣舊時文藝理論家的說法，也就是怎樣燃起全份心靈的火花的問題。在今天文化新都的新嬗遞之下，這却又決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初期悲憫為懷，怎樣創造財富，營救飢餓的奴隸的問題。

所以，無疑問地這新型文化的創造，必然將由朝氣蓬勃的新興中國人民大衆担任着主力；作爲這蓬蓬勃勃創造的主要場所，對於這「文化古都」來說，我沒想着可能並不在這「古都」的古老範圍而將是一片新移的天地。至於對於本有較高文化水準的階層，則第一着入手功夫必然是「揚棄文化遺產」的問題。這自然也是並不缺少豐富內容的業績；但是這歷程中所必經的階級意識的轉換，將是最先遇到的一番艱難痛苦的工程，而創造火花的啓發，必須要求一份遍體光明的肉身；而這個境界，還並不是單純形迹上和人民一道過着物質艱難的日子就能達到的。

「文化古都」的古都文化是從此要一片片的坍毀了，因爲它將逐時失去了存在的憑藉，千年帝都的「王氣」混合着帝國主義的「先進文化」，今天面對着新興的而又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民，是一個地自慚形穢了。歷史要這一份雜種的奴性的文化從這裏一片片坍毀，反之，歷史又要文化新都的新都文化將從這坍毀的遺址裏誕生。因爲新的社會存在將隨着中國人民的獅子般的英勇、駱駝般的堅韌，和嬰兒般的蓬勃純眞而在這裏生根。這自然需要一段時間，但時間也不會太

久。回憶三十年前「五四」節日，那一份啓蒙性而不免朦朧的熱情所追求的東西，今天是增添了千百倍的明確與充實了。祝福這偉大的三十年間一切爲實現今天這樣的日子而犧牲的死者！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五四」精神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陳學昭

「五四」運動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當時它提出的口號：科學民主和獨立平等，包含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反禮教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內容；「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學家的精神，表現在文字改革上，比較顯著的以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然而在思想上，「五四」運動僅僅是一種啓蒙運動，因爲當時的活動只是上層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活動，它的影響和作用還沒有廣泛地和工農大衆結合起來；因爲這樣，當着革命受到挫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之後，當着革命一天一天深入，土地革命時期，當着工農大衆的覺悟逐漸提高，革命的潮流，便把那種像胡適之樣的上層知識分子淹沒了，遠遠的抛在時代的後面，給時代的車輪踏碎了。只有魯迅先生和

廣大的人民結合在一起，他爲廣大人民的所愛而愛，所恨而恨，他寫出廣大人民的要求，他批判封建的、反動的、殖民地的洋奴思想，他不屈不撓地和反動的封建勢力作鬥爭。由於他是一直站在廣大人民方面的，由於他始終是代表着人民的，他的影響和成就有了多麼大的意義。毛主席說：「魯迅的方向就是我們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〇年——和「在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裏指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知識分子改造思想，和工農兵結合，爲人民大衆服務的道路，解放區的知識分子，文化工作者，這幾年來努力的照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走去，證明只有照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做，才是唯一的走得通的道路。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也只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改造思想，和工農兵結合，爲人民大衆服務。毛主席教導我們，不止一次地誘導我們，知識分子的生活比較好，看不慣那些粗手笨脚的勞動人民，毛主席曾引用他自己作比如：「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農

兵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爲是乾淨的，工農兵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爲是髒的。……」——「在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樣的情感，可以說，我們每個在沒有和工農兵結合之前的知識分子，都是有的，接着，毛主席又說到他革命後的情感的改變：「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兵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他告訴我們，知識分子感情的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是要經過一個苦痛的過程，是要在和工農結合的實踐中才有可能。

革命很快要在全國勝利，革命力量由農村推進到城市，城市裏有很多知識分子，中國的文化落後，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產，但是知識分子必需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輕視勞動的觀點，並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才能爲革命事業，才能爲廣大人民服務。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强大，對於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是一個便利的條件，只要知識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隊伍的後邊，而是自動自覺的跑向前去，那麼思想改造的過程一定可以縮短，痛苦也可以減少，

時間也不至於浪費。城市裏有很多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工廠和工人，以及其他的勞動人民，到工人中間去，到勞動人民中間去，去幫助提高工人的文化，開展他們的文娛運動，這對於改造自己思想，體驗勞動，是一個最好的實踐。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蒲　觀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劃出了一條線，在這條線以前和以後顯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五四」以前的八十年間（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面，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面，面對着亡國的悲運，也曾經一次次不斷地掀起改革的浪潮，發動革命的鬥爭。翻讀那八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在苦難與黑暗之中艱難困苦，披荊斬棘地摸索着前進，他們追求着光明，但不知道光明究竟在何處；往往在好像已經從無邊黑暗中顯出一線光明來時，瞬息之間，這一線光明又被更濃密的黑夜所埋沒。到了「五四」運動以後的近三十年間，情形却完全不同了。雖然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的路上仍然有頓挫，有曲折，但

是好像有熊熊不滅的巨大火燄始終照耀着前進的道路，把千百萬羣衆集中到了一個方向，一個領導向勝利的方向。這是在「五四」以前的八十年間所看不到的。

「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史中，早已有過像太平天國那樣的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千百萬農民羣衆積成了巨大的力量，向那在外國資本主義支持下的封建專制王朝進行決死的鬥爭。但是他們只能做到給封建統治秩序以劇烈的破壞，却不能眞正使社會推向前一步；而在他們還沒有在初步的勝利上站穩脚步時，他們的成就已經像冰山一樣地在一夕之間悲慘地崩壞了。

「五四」以前，也曾有過像義和團那樣的從農民大衆中自發地興起的反帝鬥爭。但是這種鬥爭却表現得那樣地粗糙，那樣地幼稚，甚至被封建統治者所愚弄和利用。他們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並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

在「五四」前，還曾經有過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爲主的革命運動，這一革命運動一直發展爲結束了二千年的封建君主政體的辛亥革命。爲了準

備辛亥革命，當時的極多數知識分子奔走呼號，出力拚命，的確表現着無限的愛國熱情和爭取民族進步的赤忱。但是他們既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和什麼敵人鬥爭，也看不清楚他們所努力奮鬥的目標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爲脫離了廣大羣衆的個人主義的搏鬥。他們朦朧地想望着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却隨時準備着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妥協。結果他們自己也不能不發現，從滿清王朝換成民國的招牌不過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悲喜劇。廣大人民仍然不得不在形式上稍稍更換了一些，實質照舊而且變本加厲的重重壓制下面重新找尋出路。

在「五四」以前的革命鬥爭的波濤當然不出以上所述這一些，總括起來說，就是在「五四」以前，革命浪潮從兩方面來。一方面是農民羣衆，他們是巨大的革命力量，但他們得不到正確的領導，從他們的自發的鬥爭中，雖然散發着歷史的光芒，却並不能產生足以代替舊社會而向前進步的新的生產方法，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和農民不同，能夠提出在當時說起來是新的東西，但是他們不能也不敢去動員中國人民中最巨大的力量，農

民的力量，他們自己在爲自己的理想而鬥爭時也是軟弱的動搖的，他們或者作着絕望性的拚命鬥爭（特別表現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或者用妥協的方式企圖出賣人民大衆的利益而實現自己的出路（特別表現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而人民大衆也還沒有足夠的覺悟程度與力量來防止和對抗這種出賣行動。

「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歷史，中國的革命的基本形勢就是這樣的。

很淸楚的，在「五四」以後，一切情況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的社會經濟固然仍舊是以農業爲主（佔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仍舊是最龐大的革命力量，但是農民革命的隊伍遠不是太平天國或義和團所能比的了。農民羣衆不再只是對舊秩序的偉大破壞力量，而且成爲新中國的偉大建設力量。無數爲建設新中國所不可缺少的新的東西從農民革命隊伍中湧了出來。農民羣衆當然更不再是狹隘的排外者，而是集合到有明確的方向與步驟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鬥爭中來了。

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知識分子仍舊是常常能起革命中的先鋒作用，但

這先鋒都已漸漸地不是脫離羣衆的個人英雄了。從「五四」運動以後，一批批的革命知識分子走向了廣大的人民羣衆中去。一般說來，三十年來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是漸漸地拋棄了那種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考慮中國前途的想法，而承認了中國的出路只能按照人民大衆的利益和依靠人民大衆的力量才能實現。

「五四」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仍舊有時參加革命，有時又從革命退却乃至叛賣革命。但是當他們參加革命時，他們已不能使革命完全照自己的意願行進，因此，在他們退却乃至叛變時，革命並不因此而被葬送。

這種種變化究竟是因何而來的呢？

關鍵就在於「五四」運動的時期。

「五四」運動緊跟着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發生。帝國主義列强之間的混戰深刻地標幟着資本主義世界的沒落崩潰的開始，而從大戰中勝利地出現了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又給人類的新時代吐露了眞實的光芒。——這樣的世界形勢對於中國不能不起重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以學生愛國運動開始，但隨即展開爲工商各界的運動，最重要的是工人羣衆在這時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以獨立的單位而參與了政治運動。在「五四」羣衆運動以前，又已先有一種新的文化思想運動作爲前奏，這種文化思想運動是以科學與民主做旗幟的。隨着羣衆運動的展開，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播，這就使科學與民主有了更堅實的內容。開始只傳播於一些革命知識分子中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新興的工人階級的羣衆運動相結合，其結果就在「五四」運動後二年（一九二一年）正式誕生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有了共產黨的組織，中國的工人運動更顯出了飛速的發展而成爲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的中心力量；社會主義思想也就在中國愈益站定了脚跟，在文化思想中成爲主導的力量。

「五四」運動時期就是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這兩年在中國近代史上也就是劃分前後二大階段的分水嶺。

「五四」以後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新面貌是由何而來的呢？很分明的，就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爲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之出現，就是由於掌握了社

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科學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之出現。

在「五四」以前，儘管每一次的羣衆革命都是在客觀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意義，那是因爲羣衆在實際上感受到這兩方面的壓迫，因而從不同的角度發動了鬥爭；但是明確地、全面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是在「五四」羣衆運動中，並由中國共產黨給以系統的說明，於是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由此才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

在「五四」以前，從農民羣衆的自發鬥爭中（太平天國）表現着一種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的理想，但那不過是對於原始式的平等生活的嚮往，本質上是帶有落後性的。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也表現着某些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的因素，那不過是由於朦朧地感到資本主義體制的沒落，想給資本主義找改良的出路。這兩方面都不能給中國指明前途。只有到中國共產黨把科學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才明確地指明了中國的前途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並且指明了中國要第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而走向新民主主義，然後第二步再走向社會主義。

正因此，中國有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了强有力的工人運動，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面貌就不能不發生重大的變化。廣大的農民有了正確的領導。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有了他們所值得爲之而獻身的方向。中國革命就有了勝利的保障。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於最大多數的人民大衆意願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湧現到地平線上來。

了解「五四」運動也就是要了解一部中國近代的歷史——中國近代革命史，並且由此而更對於中國革命到達勝利之日的今天的局勢以至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國今後的發展取得更充分的認識。這裏所說，也許可以作爲對這樣的了解與認識的一個發端。

「五四」與今天

田家英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到今天已經整整三十年了。「五四」運動是一個政治運動，又是一個文化運動，這個運動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時期，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有許多的優秀人物捨身革命，前仆後繼，爲中國的獨立與民主而奮鬥不懈。但是直到「五四」運動，在七十九年中，中國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性的。其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覺悟，還沒有自己的先鋒隊。人民自覺或不自覺地跟着資產階級走，革命的指導者是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正因爲如此，這七十九年間，經歷了的太平天國運動、戊戌政變、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運動，都被外國帝國

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沉沒在血海之中。一九一七年的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把落後的東方驚醒了，把中國也驚醒了，馬克思主義——這個人類最高智慧的普遍眞理，傳到中國來，于是發生了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參加的「五四」運動，發生了有廣大無產階級參加的「六三」運動，再過兩年，即一九二一年，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一旦與中國人民的實踐結合起來，就發生了極其重大的結果。「五四」以來的三十年，在世界，在中國都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那七十九年，證明了這樣一條眞理：舊民主主義不能救中國。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由于其政治的指導者是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這個運動就不能不帶着極大的盲目性。從洪秀全到國共合作前的孫中山（這些中國革命的先行者，我們是對他們尊敬的），都不能根據歷史發展的行程明確地提出中國革命完備的政治綱領，不能爲了實現這個政治綱領而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與每一重大事變當中的正確政治主張。即令有比較好的綱領和主張，也不能採取正確的方法予以堅持和實現。這個運動又不能不帶着極大的狹隘性，

廣大人民沒有自覺地捲入直接鬥爭的漩渦，沒有人民的眞正覺醒與眞正發動，因而人民的敵人就不會被打倒。「五四」以後的革命大不同了。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破天荒第一次在人民面前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確定了中國人民翻身的具體道路。二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人按照這個目標與具體方針，領導了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與抗日戰爭，他們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依靠羣衆的自覺和自動，創造了城市與鄉村革命羣衆鬥爭的新形式。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反動勢力，在這個革命面前，一切對于撲滅舊民主主義運動行之有效的反革命辦法，用來反對這個新民主主義運動，却是完全無效的了。

「五四」以來的三十年，給了中國人民很大的鍛鍊。中國人民在這種鍛鍊之中，完成了一件大事，這就是完成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深深地結合起來。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就是這個結合的典型。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民主運動中，只有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黨，能够領導人民，團結一切同盟者，去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勝利。中國人民有了這樣的領袖，這

樣的政黨，是最大的幸福。

「五四」所創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很快就要澈底完成了。中國的面積和人口都與歐洲差不多相等。現在，這樣一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的國家，人民已經動員起來，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的獨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國就要出現，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化，是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世界歷史上的第三件大事。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 × ×

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眞正澈底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明這個政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爲中國人民服務」，「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個政黨完全信任人民，毛澤東同志有兩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依靠民衆則一切困難能够克服，任何强敵能够戰勝，離開民衆則一事無成。」毛澤東同志以這樣的思想創造了中國共產黨，以這樣的思想教育了我們。

「五四」以後，在中國，曾經存在着對于知識分子的兩種方針，一種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國共產黨的方針，一貫的是團結、改造並引導廣大知識分子與人民結合、爲人民服務，這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引導知識分子去仇視人民、與人民作對，以便訓練其爲反動統治的奴僕的方針，是絕端相反的。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方針，完全符合于民族與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于知識分子的切身利益。知識分子只有在這條方針之下，決心爲人民服務，才有自己的偉大前途，才能成爲新中國的有用人材。

爲人民服務，這是一個新的人生觀。爲人民服務，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要在日常的實際生活中去處處體現。什麼是人民？毛澤東同志明白地告訴我們：「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與小資產階級。」工人是領導革命的階級，是新中國的建設的主要力量，農民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礎，士兵是武裝了的工農，是戰爭的主力。爲人民服務，就是爲工農兵當勤務員。首先要改變輕視勞動人民的觀點，同情他們的痛

苦，擁護他們的利益，把人民的利害作爲衡量是非的唯一標準，凡是有利于人民的，則以排除萬難的精神去實現，凡是有害于人民的，則以全力去反對。並且把這種思想覺醒變成爲實際，到各個崗位上去，爲人民事業作各種具體的工作，到工廠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同工農兵做朋友，向工農兵學習實際鬥爭的豐富知識，一心一意地做他們的小學生與勤務員。要善于向羣衆學習，向毛澤東學習，更要善于把這兩種學習結合起來，使我們能够爲人民服務更多與更好。

「五四」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這個口號在當時還只能是樸素地提出來。今天，我們要以毛澤東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來武裝自己的頭腦，來充實「五四」以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即將在全國勝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工作更加偉大，更加艱鉅。今天，我們要實現的民主，就是以工農爲基礎的人民的民主；我們所追求的科學，就是建設工業化的人民國家的科學。只有以爲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從事艱鉅的工作，我們才能對中國對人民有所貢獻，才能成爲眞正的民主與科學的戰士。

紀念「五四」運動的三十週年，要在毛澤東爲人民服務的偉大旗幟下，繼續歷史的事業前進！

從「五四」看知識分子

宋雲彬

知識分子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中都起了領導作用。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很多，起領導作用的知識分子對革命認識不够，不能和工農大衆結合起來也是原因之一。「五四」運動由青年學生發動，接着大都市的產業工人都參加了，知識分子和工人大衆就開始結合起來。工人運動漸漸開展，工人們紛紛組織團體，參加政治的、經濟的各種鬥爭，而知識分子經過這一次政治鬥爭，思想亟變，認識中國革命的新方向，知道只有工農大衆才是可靠的同盟者。從此以後，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而知識分子則在聯合戰線中儘它的做先鋒與做橋樑的任務。從此以後，中國的革命漸漸走上成功的道路。

但是，知識分子有它的先天的弱點。當它沒有能够與工農大衆結合起來，沒

有能够與工農大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沒有能够下決心爲人民服務，沒有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羣衆化的時候，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知識分子又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性，如果不能加以克服，到了革命的緊要關頭，他們會脫離羣衆、而採取一種獨往獨來的消極態度。甚至於感到日暮途遠，索性走回頭路，去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爲他們服務而反對羣衆了。「五四」運動到今年三十週年。我們看，在這三十年漫長的歲月中，不是有一些知識分子，當年以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姿態出現，後來慢慢地退嬰、落伍、甚至於反動了嗎？

不過退嬰、落伍的，究竟還是少數人；至于反動的更加是少數中的少數了。而且前一輩的、少數的雖然退嬰、落伍或者甚至于反動了，但多數的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又趕上前面來了。所以中國的革命始終在向前進、沒有因了少數知識分子的退嬰、落伍或反動而受到阻礙。

「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

功的。」「五四」運動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所發動，並且起領導作用的。現在紀念「五四」三十週年，年長一輩的知識分子應該好好兒自省一番，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還配得上稱作「革命的知識分子」嗎？年青一輩的，也應該自己檢討一下，是不是還留有一些知識分子所當有的弱點而沒有能力克服？因爲我們在革命事業的建設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的呀！

「五四」與科學

張東蓀

「進步日報」記者堅囑我爲「五四」紀念作一篇短文。在該報記者未有此求以前，北大同學亦來有此種徵文，同時幾個學術團體又有連名信件，我深感對不起各位，因爲自北平解放以來，我自己的生活反而感到失了正常了，時常有聚會等等。我是一個最喜歡規則生活的人，生活上稍稍不規則，而與往常不同，便無法提筆做文，所以本篇不僅只是一個短文，並且直是胡亂寫的，簡直不成爲短文，尚求讀者原宥。

「五四」精神所寄託的是兩個口號，即民主與科學。關於民主非片言所能盡，今且不說。現單就科學而論，如以科學立國，則須首先建立一個生產計劃，我希望軍事粗定以後，新政府成立，除了軍事部分復員的偉大工作以外，第一件

事恐怕就要算是必須製訂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了。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而要急起直追至工業化的最低水準，恐怕非經過有接連的五個五年計劃不爲功。我並且以爲，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恐怕不能完全注重在工業方面；至少關於農業須佔相當重要的地位。關於農業，我又以爲製造農業上耕種使用的機器還是其次，恐怕首先要講究水利。須知水利是需要很大的工程的，非國家的力量不能舉辦，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恐怕是今後最急的事務了，——尤其是在長江以北。

爲了生產計劃，這便不能不使教育與之相適應。講到教育似乎是偏重於如何造就人材。其實已有的人才如何利用亦是問題之一面。今後如何動員已有的人才與如何新造人才，都得有一個詳密的計劃。這便是與科學有關。總之，我們必須把科學與人生這兩個方面由實際使用而打成一片。青年人應知這才是中國眞正的出路，應當把自己去配合這個前途。僅有口號與熱情是不够的。所懷萬端，而所可得言者却止於此。

「科學與民主」

周建人

我們今日以特別高興的心情來紀念三十週年的「五四」紀念日，因爲「五四」運動的發源地的北平已經獲得解放，在封建殘餘、官僚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已經翻了身。而且最近以蔣匪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中心地區的南京也解放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宣告滅亡。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在共產黨與毛主席正確領導之下成爲强大無比的力量，英美帝國主義雖企圖阻撓，無異「螳臂擋車」，無非招受可恥的失敗罷了。中國人民現在已走上了眞正人類的道路，努力前進，達到眞正人類的境地是不會遙遠的。還有，「五四」運動的時候，曾提出「科學與民主」，今日我們所了解的科學已不是「爲科學而科學」的抽象概念，更不是爲少數人的利益及爲戰爭販子効勞，這是不必多言的，而是爲人民服

務，並進而爲人類的利益與幸福服務。所謂民主，也不是指少數人有政治權利與個人自由的「民主」，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這是眞正的民主。因此我們以特別高興的心情來紀念這「五四」，大家必定非常歡欣鼓舞。

「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

何幹之

「五四」時代有兩個基本口號，代表「五四」的革命精神，即民主與科學。然而在聯合戰線內有各個階級的代表，尤其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代表，由於階級的要求不同，雖則在同一戰線內，而對於這兩個基本口號，也有不同的要求。

第一、民主。有各種不同的民主。有由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國，也有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是不同的階級所要求的民主。民元，中國有一個約法，這是歐美民主制度的模仿。民初北京政府有關於內閣制和總統制的爭論，這是中央政府要以美國的總統制爲法還是以法國的內閣制爲法的問題；這一次的爭論，是以袁世凱的解散國會而收場了。民六護法戰爭，中國分裂爲兩個政府，北京政府爲北洋軍閥餘孽所操縱把持，是反動的政權。而在廣

東，粵桂軍閥橫行，孫中山在軍政府裏是被排斥的；至於孫中山所護之法，也是民元的約法。到「五四」時代，孫中山等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他們相信不經過革命的破壞，而可以着手革命的建設，可見那時國民黨的領導者對於建國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不久，胡適等又捧出好人政府的招牌，妄想在軍閥統治下拉攏幾個他們意想中的所謂好人，所謂第一流人才，來組織內閣，這就是民主。總之民元約法也好，美國式或法國式的政府也好，好人政府也好，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或是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相勾結的聯合政權，而爲中國資產階級所要求的。

至於工人階級方面，那時以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爲代表，而發出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的呼聲，這呼聲，用我們現在的慣用語來說，即是工人階級革命的勝利，是馬列主義的勝利。所以當協約國勝利之後，舉國同慶，喊着公理戰勝强權的時候，他確切地說這是工人階級革命的勝利。俄國革命之後，有些惡意的宣傳家說這是「過激黨」在俄國的造反；有的評論家又說這是民主主義戰勝專制主義，而他則確切地說這是馬列主義的勝利。那時還有過關於

「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胡適輩目擊着馬克思學說的逐漸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當然必須研究實際問題，但是只有馬克思主義纔能夠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而胡適輩却把牠當作盾牌，來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表示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李大釗的主張，早已是科學的預言了。中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而又爲馬列主義所武裝才能夠獲得勝利，這不是早已被證明的事實麼？

第二、科學，即科學思想。也由於「五四」運動是各階級的聯合，所以同時出現於中國的也有各種各樣的哲學。

胡適首先提倡杜威的實驗主義，還有羅素、杜里舒、柏格森的唯心主義等。各種唯心主義不用說是反科學的，而當時流行較廣的實驗主義，實質上是機械主義，一觸到社會問題，則是唯心主義。「五四」之後，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一場大的論辯，即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辯。爭論的主題是關於科學能不能支配人生觀的問題。張君勱諸以人生觀爲主觀的，直覺的，固然是極端的唯心主義，而丁

文江等也承認有的現象，科學所不能解釋的，我們只好存疑，並自號為存疑的唯心論。他顯然地是把科學至今尚未解決的關於宇宙間的不可知的問題和科學能不能解決宇宙問題及社會問題，混為一談。實際上是不可知論者。而胡適後來評論這一場論爭的時候，却又拿出他的禿頭的歷史觀，即把經濟、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等要素的作用，等量齊觀，都同樣的影響着支配着人生觀，而並沒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區別，實質上是唯心主義者。這些人思想上的病根是只見一些現象而不知在萬花繚亂的現象中看本質，甚至於有意否認事實，捏造歷史。例如胡適妄談貧窮、疾病、愚昧等五個鬼擾亂着中華，而封建勢力不在內，帝國主義也不在內。中國革命的對象既然不是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那麼胡適就變了反革命的辯護人，以至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五四」時代最先宣傳辯證法與唯物論的是李大釗 他早年所寫的「青春」一和「今」，是馬克思主義啓蒙的紀念碑。李大釗早在三十五年前就清醒地指出青春是進化發展的，無始無終的，無限無極的，青春是無窮無盡的，所以中國的進

步也應是無窮盡的。「今」即現在。歷史互相遞禪。所以現在是一個歷史過程。由昨日到今日，又由今日到明日。然而現在則是我們的出發點，因為今日對於昨日和明日有承前啓後的作用，所以我們必須以現在為立脚點推向前進。

這是「五四」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用馬克思的矛盾觀發展觀來歌頌中國的新生，這是戰鬥的人生觀，革命的哲學。

「五四」已到它三十年的紀念。這三十年中，「五四」的發祥地北平已經解放，中國革命正走向全國的勝利，這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繼續與發展。列寧早在一九一三年就預言：「不管那些『文明』豺狼磨牙欲噬的偉大中華民國命運如何，但世界上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有的農奴制度，能劃除亞洲國家和半亞洲國家裏人民大衆底英勇民主精神。」然而廢除中國農奴制度以及喚醒人民民主精神只有在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實現的，因為「亞洲各國革命向我們顯示出來的，同樣是自由派底懦怯卑鄙的劣根性，同樣是民主羣衆獨立性所具有的特別巨大意義，同樣是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的鮮明分野。」（「馬克思學

說底歷史命運」）這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的分野，就在於一切歷史事實都證明各種形式的唯心主義及機械主義的破產，各種形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破產，也都證明只有爲馬列主義所武裝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纔能够使中國人民澈底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新民主與新科學

袁翰青

「民主」是「五四」時代提出的重要口號。「五四」運動誠然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可是那時候大部分知識分子所仰望的民主還祇是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今天，由於大半個中國得到了解放，而全國很快就要解放，我們已邁進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階段。這就民主政治的本質來說，毫無疑問地已跨過了「五四」時代的要求。

「科學」是「五四」時代的另一口號。三十年來，在表面上看，我們多少有了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工作。不過這些科學工作是建在一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沙灘上的。因此，不但成就是十分貧乏，工作的方向和研究的態度更大成問題。

我們可以把中國的自然科學就研究、教育、應用三方面來看一下。在研究方

面、科學成了點綴品、祇是極少數人向上爬的階梯。在教育方面，純粹抄襲了美國的外形，空洞而與中國的社會脫了節。在應用方面，僅僅幾個大城市裏的高等華人能享受科學的成果；十分偏枯、萬分不够。如果把這一期間的科學算是舊社會裏的舊科學，那末，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我們應當有「新科學」，超過「五四」所要求的單純的科學這一口號。

我們這裏所謂「新科學」，並不是就科學的內容而言；當然，沒有一種與別的國家不同的新物理學，也沒有別處所無的新化學。所謂「新」是指的研究科學的制度、作風、態度和目標而言。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大衆的。可是我們以前的自然科學工作却不幸是殖民地型的、貴族的。如何使中國的科學成爲民族的和大衆的，是「新科學」的一個主題。

在文藝界，那種「爲文藝而文藝」的思想早已被肅淸。在科學界，却還充滿了「爲科學而科學」，「爲興趣而科學」的氣氛。是的，我們不應當是短視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深知道，在科學史上，曾經有天才科學家的純粹理論的研究發生

鉅大的應用。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今天我們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不是牛頓時代的英國。在目前，就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已經開始有計劃的合作的研究；在社會主義的蘇聯，更是集體的有組織的科學工作代替了散漫的競爭的作風。我們是這樣的落後，這樣的貧窮，如何還能以發展天才來爲個人鑽牛角尖的藉口？

決不是對於中國的科學工作者有微詞，實實在在是衷心地寄以熱烈的期望。「新科學」是有計劃、有組織、爲人民的科學工作，這是時代的迫切要求。新中國的科學工作者是不應當辜負了時代的。

中國有了新民主。

中國需要新科學！

紀念「五四」要學會生產工作

千家駒

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又說：「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集中表現），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經濟上完全不依賴外國了，經濟上完全獨立了，才算最後的解決了這個問題。」毛主席這一指示，我特地在紀念「五四」的今天提出來，是有特殊意義的。

誰也知道：「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民國八年的段祺瑞政府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北洋政府。北平的市民，以學生羣衆爲代表，爲了反對

曹、章、陸的賣國外交政策，爲了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三十年前的今天，掀起了一幕廣大的愛國羣衆運動的鬥爭，火燒趙家樓，拳打賣國賊，這就是「五四」的由來。到後來這一運動發展爲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亦即發展爲中國的新啓蒙運動。但無論是狹義的「五四」運動自身，或是廣義的中國新啓蒙運動，從基本上說，都是中國覺醒了的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每年我們紀念「五四」都必須強調「五四」運動之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因爲過去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帝國主義依然騎在我們的頭上（祇不過日本換成了美國），封建勢力非但沒有削弱，反而變本加厲，因此紀念「五四」，必須繼續五四的鬥爭精神，繼續爲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而努力！

但是今天，環境已大大不同了！由于中國工農大衆力量之空前的壯大，由于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之正確的領導，今天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力量已如日落西山，快要走進墳墓！也就是說，肅清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在基本上我們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自然，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並沒有最後地完成，猶

有待于我們的努力！但在今後，我們紀念「五四」更重要的工作，倒毋甯說是在生產建設方面。祇有在生產上努力使被破壞的工業恢復了生產，使中國工業在一二十年之內，由佔國民經濟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上升爲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使中國的經濟工業化，使中國不僅有生產生活資料的工業，而且有生產生產工具的工業，使中國的工業能够生產國防上所需要的飛機、大砲和坦克，使中國不僅工業能够機構化，而且農業也要電氣化。一句話說，祇有使落後的農業中國變而爲進步的工業中國，到那個時候，中國的民主革命才算澈底地完成，中國的獨立自主才算有了最後的保障。中國才能根本免除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且也祇有到那時，中國才能由新民主主義和平地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必須提出「發展生產」的口號，要發揚「五四」的精神，我們要加强生產，學會了生產工作，工商業的管理，以及管理都市。總之一句話說，我們必須學會了經濟工作，才能保證中國反帝反封建使命之完成。換句話說：今天紀念「五四」，不僅要澈底反帝反封建，以最後肅清帝國主義與封

建主義在華的殘餘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學會經濟工作，以達成新中國建設之使命。在中國共產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政治報告中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麼，黨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脚，就會要失敗。」這一指示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我提出了「發揚『五四』精神，學會生產工作」的口號，作爲本文的結束。

四月三十日於北平

從掌握革命鬥爭知識到提高生產鬥爭知識

杜任之

什麼叫做知識？知識可分幾門？

毛澤東說：「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一切知識都是從鬥爭中產生。人類為了生存不斷的對自然鬥爭，為了生產其物質生活資料，不斷的獲得了生產鬥爭知識。自從人類社會分化為階級以後，由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鬥爭，產生了階級鬥爭的知識這門知識，在被統治與被剝削者反抗統治者與剝削者說來，就是革命鬥爭的知

識。

在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歷代的統治者爲鞏固其統治，一向慣於施行愚民政策。他們以選用「孝廉方正」訓練奴才，以運用「開科取士」牢籠人才，從而把千百萬青年的生命力消磨在宗法規範與咬文嚼字的中間；再加之以不談「怪力亂神」，禁止「奇技淫巧」，遂絞殺了一切新知識的萌芽。中國封建社會的遲滯性和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障礙了生產鬥爭並和緩了階級鬥爭，因而使中國人民在生產鬥爭上的知識與在革命鬥爭上的知識，都非常落後。

自從西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與中國生長了資本主義幼苗以來，中國逐漸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社會。反映這個社會主要矛盾鬥爭的，是資產階級新文化與封建階級舊文化的鬥爭。近百年來，在「五四」以前，從西洋輸入的思想，差不多都有對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因而當時從外國販來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然而這種販來的新知識，除在沿海大都市變成買辦知識而替帝國主義服務外，在封建經濟與封建統治還佔優勢的中國土壤

上，是不能生長的；而那些資產階級的反封建運動鬥爭的知識被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反動同盟所阻撓，也無從發展。在這個時期，由於封建主義的束縛，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足，中國青年無論在生活上或精神上都遭受到莫大的痛苦。這就是一個大的社會運動的潛在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加緊侵略，引起了中國廣大青年的憤怒；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予了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希望；因而爆發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這個運動的基本口號是「科學與民主」。它雖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意識形態，然而也是澈底的反封建鬥爭的武器。這個運動誠如毛澤東所說「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之一。在「五四」以後，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把科學的馬列主義的眞理種子散佈到中國需要革命的土壤上，產生了中國人民文化的生力軍，成爲中國革命鬥爭的新武器。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反封建與反帝國主義」的口號，向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在這個偉大的鬥爭過程中，大大

地提高了中國人民革命的鬥爭知識；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與青年從此大爲活躍，提高了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

「一切都是從艱苦鬥爭中鍛鍊出來的。」在中國長期革命鬥爭過程中，中國新文化運動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在政治學、軍事學、經濟學、文學、藝術與哲學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也有了極大的收獲。這就是革命鬥爭知識的普及與提高，而其結晶便成爲毛澤東思想；它是蘇聯十月革命後的馬列主義與中國「五四」運動後的偉大產物，也就是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體系。它不僅指導着中國革命不斷地走向勝利，而且指導着中國人民新文化運動走向正確的方向，因而大大地發展了與提高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知識。自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與共產黨實行土地革命以後，尤其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新文化運動之發展，眞是超過了中國任何歷史時代。

但是革命鬥爭知識與生產鬥爭知識發展的太不平衡，前者的突飛猛進地發展與後者的極端落後，正表現了這種不平衡。

生產知識爲什麽落後呢？一、由於長期的艱鉅的而且迫切的革命鬥爭，中國人民新文化的生力軍「還沒有來得及在自然科學領域佔領陣地與進行鬥爭；」二、由於中國封建主義與買辦官僚之黑暗統治，民族資本主義無從發展，因而自然科學知識除零碎從西洋販賣外，是不會有若何成就的；三、由於中國農民遭受封建主義的束縛與剝削，不能自動地發展生產鬥爭的知識；中國工人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官僚買辦階級的剝削，不願接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認爲那是侵略的與剝削的工具），更不願自動地創造生產鬥爭知識。這就是中國自然科學知識落後的原因。

但是從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人民革命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與中國文化古都北平之解放），中國人民生產鬥爭的知識一定要大大地提高的。爲什麽能提高呢？一、在鄉村，廣大農民已獲得了解放，他們除盡量地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生產鬥爭的知識外，還很迫切地需要接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提高其勞動生產力；二、在城市，產業工人解放後，除改變勞動態度積極創造生產知識外，也很迫切地需要

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提高其勞動生產力；三、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後，不僅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而且要以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爲基礎與方法，去批判地接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並進一步創造中國的新自然科學；中國人民政府必然要滿足工農大衆對生產鬥爭知識之很迫切的要求，並能供給知識分子與科學家以發明創造的許多便利條件。這就是中國生產鬥爭知識必然要提高的根據與條件。

今後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與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中國以後，革命的主要任務是爲建設新中國與新社會而鬥爭，因此必然要大規模地展開生產鬥爭。生產鬥爭是需要生產鬥爭的知識的，同時在生產鬥爭中必然又提高生產鬥爭知識。然而這一發展過程，是與掌握革命鬥爭知識分不開的。

自從中國共產黨掌握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任何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偏向以來，才大大地發展了、提高了並普及了革命鬥爭知識，因而爭取到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因此，今後也只有加緊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掌握

革命鬥爭知識，才能發展和提高生產鬥爭知識；只有掌握革命鬥爭知識，才能爭取到革命勝利；只有爭取到革命勝利，才能提高生產鬥爭知識。今後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廣大的工農結合起來，携手並肩，必能提高生產鬥爭知識，並使之結晶成爲中國的新自然科學，以指導中國大規模的生產建設。這應該是紀念「五四」運動三十週年的任務之一。

三十年的革命運動與馬列主義的鍛鍊，創造了偉大的東方革命鬥爭知識之寶庫——毛澤東思想，而中國革命鬥爭知識之水平，今天在全世界上說來，恐怕也是僅次於蘇聯的。今後如果以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恐怕不需要三十年，必能超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而與蘇聯並駕齊驅創造人類新世界，我們希望在「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能夠實現了這個偉大的理想！

「五四」與文字改革

胡愈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文字改革運動開始的。當初「新青年」雜誌所號召的「文學革命」，說得具體一點，實在不過是一種文字改革運動，目的在於廢除封建社會的舊文字，創造平民化大衆化的新文字；廢除文言文、創造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廢除或者改革方塊字、創造人民大衆容易學會的新語文。

從文字改革運動開始，新文化運動向着社會科學的各方面廣泛展開。正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裏所說：「『五四』以後產生的文化生力軍，「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

拿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來做一個總結，文字這方面的進軍雖然發動得最早，所獲得的勝利並不算太大。和哲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以及文藝各方面的戰線來比較，文字戰線上所得的戰果是要少一些。

只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最初十年中，文字改革運動，有了一些進展。在以後的二十年中，就停頓下來。特別自從抗戰以後，文字戰線方面，即使不是全面退却，至少也只是採取了守勢。

在「五四」運動初期，所獲得的進展是什麼呢？第一是打敗了文言文，建立了白話文的新陣地。第二是開始向方塊字進攻，提出了漢字的存廢問題。

到此爲止，只是到此爲止。以後我們就沒有能夠取得更進一步的決定性的勝利。

從文言文變爲白話文，這是文字改革運動所得到的最大的成就。但是白話文在開始時，就有人認爲是旣不「白」，又不是「話」，總之還不能成爲適合於人民大衆的文字工具。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能夠得到圓滿解決。不錯，十

餘年來的大衆語運動，和方言文的討論研究，都推動了白話文有一些進步。特別是十年來解放區的作家們，把北方農民的口頭語，大量吸收過來，使白話文變得更加豐富，更加生動。因此現在的白話文，和初期的白話文比較，已經是更接近口語，更大衆化了。但是要使我們的文字工具，眞正做到了完全大衆化、口語化距離還遠得很。很多在報紙刋物上的文字，還不能被工農大衆所讀懂。早在三十年前被打倒了的文言文，時常在白話文中間，借尸還魂。直到現在，中學校的學生，也還必須選讀古文。在各種進步團體的公共文告中，文言文沒有完全被洗刷。尤其是近十年來，有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喜歡收藏線裝書，做五言七律詩，成爲一時風氣。可見單從廢除文言文這一件事來說，也沒有做得澈底。

從文言文改爲白話文，本來就不過是對封建社會舊文字的妥協，並沒有從基本上解決文字問題。從基本上解決文字問題，只有從廢除方塊字，或改良方塊字入手，這是在「五四」時代早已有了定論的。錢玄同曾經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辨音而爲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

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爲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因此他主張：「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現在看來，錢玄同這一廢除漢字的主張，在原則上依然是正確的。漢字按照方塊字的形式，沒有可能作爲中國人民大衆的文化教育工具。方塊字有一天要被宣告死刑，是確定的。但是文字和一般的精神生活的方式相同，不能用命令來廢除，也不能在短時間內加以改造，一定只有通過長期的逐步改造的過程，到最後才能完全廢除舊的，建立新的。

由逐步改造漢字，幫助漢字教育，以達到代替漢字，廢除漢字，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目的。這就是說，首先用拼音的新文字，來幫助兒童和文盲學習方塊字，局部解决方塊字的「不便於識，不便於寫」的困難，以後使漢字和新文字混和起來，最後做到以新文字，代替漢字。

但是三十年來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却並沒有能夠依着這個方向走。這一方面是由於一般知識分子對於漢字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由於新文字運動多少走了偏向。新文字工作者多年以來所努力的只是創造拼音字，以代替漢字，並沒有把新文字運動和改造漢字工作結合起來。新文字工作者，直到現在還只是在農村中打游擊，對於幾千年來方塊字的堅固堡壘，並沒有動搖絲毫。

所以從整個的說，「五四」以來的文字改革運動，只能說是剛開了頭。許多基本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少數知識分子所用的文字工具，依然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所遺留下的一套陳舊不堪的工具，由文言改爲白話，最多不過是在舊的工具上面，塗了一層新的油漆。至於佔人口最大多數的勞動羣衆，至今還沒有一套適合於他們使用的文字工具。

現在知識分子都明白，一切應當做到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但是我們沒有一種適宜的文字工具來傳達羣衆的思想感情，並向羣衆傳達思想感情，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呢？

在全國解放、人民翻身之後，要是僅僅爲了上識字課，爲了消滅文盲，就要費去整十年的寶貴時間，這又是多麼大的浪費呢？

自然，曾經有機會受過長期文字教育的少數知識分子，並不感覺到文字改革問題的嚴重。但對於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不識字的工農羣衆，這問題是嚴重的，需要立刻解决的。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當人民革命獲得勝利，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的時候，我們不應當忽略一件事，那就是完成「五四」以來所沒有完成的文字改革工作。這一件工作是長期性的，但也是重要而且迫切的。

「五四」紀念再談談新文字

陸志韋

中國的封建思想是根深帶固的。一方面封建社會養成封建思想，又一方面封建思想仗着封建性的文字來發表、流傳，也仗着它來排斥、剝削那些不同情於封建思想可是必得在封建社會裏生活的人。中國的文字爲什麼是封建性的呢？因爲他從來就是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文字。原先是屬於祭司的，後來變爲貴族的，卿士大夫的，又變爲九品官人的，未入流的，跟靠着地主、商人吃鑲邊酒的唸書人的。用這樣的文字來擁護思想，思想就逃不出封建性的範圍。老百姓並非沒有思想，可是發表思想的工具讓統治階級覇佔了。封建性的文字不容易記錄那接近於老百姓的生活的思想。眞正記錄下來的，當然只能有聖經賢傳，跟好些花花綠綠的文章。考工記人家唸不懂。齊民要術只可以要一種改頭換面的文字來寫。至於工人、農人的生活跟技術從來沒有淸楚的記錄。

從這立場看來，「五四」運動的解放工作是看準了目標放炮的。不打倒封建

性的文字，就不能解放封建性的思想，也就不能消滅封建社會。這是「五四」以來白話運動的重要性。

封建文字的鎖鍊又是雙重的。第一重是不許人說話，只許寫文言文。第二重是不論寫文言也罷，寫白話文也罷，只許用方塊漢字，不許用拼音文字。世界上只有中國人是這樣的苦命，受了這雙重的剝削。文言文是古文，就有人把他比做梵文，或是拉丁文。這只見到了一重鎖鍊，沒見到兩重。中國人的苦，苦不堪言，是無可比擬的。中國人口等於亞利安人種的一半。教中國人寫文言的滑稽，有點像教全世界的亞利安人用蘇馬利亞的象形諧聲文字來寫古波斯文，或是古希臘文，用漢字寫白話國語呢，就好比蘇聯人、美國人，用蘇馬利亞字來寫現代的莫斯科語，芝加哥語。

白話運動的成功只打斷了一重鎖鍊，就是文言，可沒打斷第二重，就是漢字。其實第一重也沒全然打斷，因爲我們寫的白話不是純粹白話。「五四」以來的白話我管他叫「八不像」的白話，是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

不西、不古不今的。有人批評我說「八不像」不對，只可說「六不像」。那也罷了；反正是不像，就是不像話。那不像話的教科書跟報道文字又害了我們三十年了。

人爲什麼不寫白話呢？因爲不會寫，不敢寫，也不願意寫。爲什麼不會寫呢？因爲不會說白話。只會說甲種方言的人偏愛寫乙種方言，可是他不會說乙種方言。比如蘇州人偏愛寫國語。（「魯智深醉打山門」，蘇州話等於「三門」，「我們、你們、他們」）。他不肯學國語，那爲什麼不就寫蘇州話呢？因爲不敢寫，怕人家瞧不起，怕人家說是「九尾龜」，是崑戲裏的小丑；又怕寫不成眞正的蘇州話，怕這樣，怕那樣。他本是希望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報酬，他本是投機的。甭說蘇州話，就說國語文學罷，這多少年來儘有些口說國語的人，一提起筆來，就是「八不像」，寫小說呢，對話倒是地道的北京話，敘事就不成，還不如兒女英雄傳。他眞不願意寫白話，因爲寫白話實在太難了，因爲每一個句子、每一個新鮮一點的名詞都得經過一番鍛鍊。他怕勞而無功，怕銷路不廣。總而言

之，還是怕，怕吃苦，怕保護不了他的特殊權利。他的特殊權利是什麼？是會爛用文言文、摹倣紅樓夢。白話文是不容易寫的。可是也不能像老頑固說，「你不會文言文，就連白話文也寫不好。」這話太不對了。我們爲什麼寫白話文？難道要讓桐城派來欣賞麼？

要澈底的寫白話文，不論用哪一種方言，還儘可以用漢字來寫，並且好些土話，都可以在古書裏找着古漢字的代表。不考古也成，只須大量的普遍的。

寫別字

比如寫北京話，儘可以把「尸屍詩師獅施蝨濕失」全都寫成「尸」或是「失」。昨天「進步日報」所載的新華社電台廣播，「南京解放的消息在二十四日晚間傳到瀋陽以後」，滿可以寫成「男京姐放的消昔在二十四日挽尖船到沈羊以後」。只是社論開頭的兩句，「連日捷報頻傳，昨天又逢喜雨」，斷不能那樣簡寫。原文也不知說些什麼鬼話。我並不在這裏開玩笑，普遍的寫別字確是可能的，並且古人也眞這樣試過。漢朝人寫了成千的別字，現在叫做「段借」，叫做「經典異文」，其實都是別字。別讓司馬相如、揚雄那些四川老

迷住了，他們儘寫別字。這樣的寫法，乍看看不慣，多看就成了。再不然，把有些字聯起來寫，有的分開寫，也就成了。那樣就再不必寫簡筆字了。「擁護毛主席」不必那樣「拥护」了，滿可以這樣「永戶」了。這樣**寫北京話**

只需要一千二百多字，四聲全備。廢除四聲呢，就只需要四百來字，那可一定不行。寫廣東話，也許得用二千多字。其餘的方言在這兩個數之間，這是變相的拼音文字。人家用字母寫拼音文字，我們用音綴來寫，也不妨說是這老大帝國自力更生，又是古香古色的辦法。試想你們報館的排字工作會減輕多少。漢字的打字機立刻就行得通，只是訓練的時期要長一點。衙門裏的長衫黨有好些就此失業。北京區的工農大衆眞就會在短期間之內學會寫字，做文章，發表思想。

以上所說的，雖然不是開玩笑，實際我並不敢這樣主張，也準知道不會有多少人贊成。我主張的還有乾乾脆脆的**用拉丁字母拼音**。這裏，我們不必多談技術問題，比如用拉丁化呢，還是

用國語羅馬字呢，要不要四聲符號呢，怎樣的詞才可以聯起來寫呢，諸如此類的技術方面需要研究、試驗、批評、修改。我覺着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知識分子之中，已經有好些人能了解拼音文字的重要，並且肯學習。目前的問題是怎樣把技術傳給工農大衆，讓他們對文字有急切的要求。

有一件事教我很失望。在老解放區，拼音文字好像推行不開。跟着解放軍來到平、津的，只有華北大學的胸章上，冀南出產的煙捲的紙包上，有幾種報紙的名稱上，還帶着幾個拉丁化字。我打聽過幾位從不同地方來的幹部，據說拼音文字不大通行了，老百姓不需要他。

凡是爲中國人的文化水準着急的，不能不把這情形看得十分嚴重。老百姓爲什麼不要拼音文字呢？我沒有在解放區工作，我能說的理由只是推想的，不是考驗出來的。據我看來：（一）老百姓整天忙，使用着落伍的工具，跟各畜的土地奮鬥，他們沒有時候來搞什麼「文化」。我早已說過，說了又說，中國的問題不是掃除文盲。（二）鄉下人，在文化上，老是隨着城市的，在任何條件之下，

農村社會免不了這種毛病。這些年來，從日管區跟蔣管區輸入的日用品、奢侈品，那些商標上只有漢字，沒有拉丁字。鄉下人一進城，滿街是方塊字的招牌，唸了拉丁字，連店號都不認識。（三）幹部們不提倡這個，黨政軍的首長多半對他不發生興趣。（四）拼音文字的內容太偏重政治意識。單憑口頭宣傳，電台廣播，已經可以學得一套新名詞，再不需要文字了。反過來說，拼音文字並沒賜給人簡單的衣食住的常識。（五）拉丁化的拼法（所謂「北拉方案」）根據山東半島的方言，在晉察冀行用，未免有點隔膜。

總而言之，過去的工作可說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完全成功。自從解放了大都市，一個新局面臨到了，以後我們的民衆不單是農民，還有上百萬的工人，特別是大工廠的工人。他們的需要跟農民不同，他們的政治意識比農民高，學習的範圍比農民大，也更熱心的追求文藝。城市的幹部以及知識分子應當多爲他們着想了。

他們需要怎樣的文字呢？我先不肯定是拼音文字，老實說，我怕觸犯了有些

威權者的忌諱。國營事業以後不許用拼音的牌號。（也許我誤解了；只禁英文，不禁拉丁字，這樣的忌諱可以從兩方面來認識他。從培養民族自尊心的方面看來，這是可取的。然而一不小心，就培養了死僵派，一味提倡漢字，保存國粹，那是一無可取的。）

無論如何，我們說話要接近民衆，做文章也要接近民衆。毛主席屢次三番的提示我們，只是我們不聽罷了。城市的民衆第一是工人，不是官僚，也不是學生，更不是大大小小的民主人士，我只要求大家先用漢字來寫城市的大衆話，用大衆話來修改中小學的教科書。寫這麼個時期，大家自然會知道拼音的文字需要不需要了。以後技術的傳佈一天比一天廣，交通一天比一天快，方塊漢字趕得上這廣度，這速度麼？大家試一試，就會切身理會拼音文字的功用了。

對於知識分子

讓我說幾句冒失的話。凡是不會用打字機寫一種外國語的，不會了解他一輩子在方塊字上浪費了多少時間。沒有看見過西洋的電信交通，用排行機（Linotype）排報紙，也不會知道中國的書報業的不

中用。不說西洋罷，近看暹羅小國，他們的語言結構跟漢語一模一樣；他們的文字，從語言學看來很不合理，可是拼音的，現在呢，連粗工、連家庭的「使女」，都能在短時間之內，學會唸報紙，看小說。中國人的浪費眞是大極了。一個世界上極窮的國家居然想用世界上極古極難的文字，越難就越窮。越窮就越不想法子麼？知識分子學會了幾個漢字，費了不少的腦筋，取得了特殊的權利。我們眞想利用這特殊權利來剝削別人麼？往後就少有人讓我們剝削了。以往我們寫點古文，寫點「八不像」的白話，在小圈子裏互相欣賞，互相吹拍，從今以後那小圈子會越弄越小，除了新政府也上了舊政府的圈套，用政治勢力來擴充他的範圍，再讓文化落後，再讓烏龜身上背着祖宗的殼，讓恐龍給自身的盔甲壓死，現在不知有多少人下了大決心，想用舊文字來發表他們心目中所謂大衆的思想情緒，不說別的，單看老解放區的文藝，其中有多少隔膜呀！哪一個劇本能在舞台演出，不用不修改的呀！

大家的需要不單是富於政治意識的文章；自然那是極重要的，可是不完備，

我們要技術的進步，生活的改良。我們的文字必須是進步改良的工具。眞正的民主政治不僅要民衆能接受政治宣傳，還得要求他們用文字來批評政治，創造政治。要不然，我們只能有一個知識分子專政的國家，知識分子永遠是少數人，大家口口聲聲要發動勞動大衆，可是在文字上好像只希望由已經在舊社會取得特殊權利的人來領導文盲大衆。我們並不能像平均地權式的把文字的產業分給大衆，所分的只是些「不毛之地」，無濟於事。我們得創造新產業。

我們思想要前進，手續得弄清楚，要四平八穩。

最低的要求

有幾個：一是趕快用大衆話修改中小學的教科書，學寫報章文字，不能再用「普通話」了。二是在各大城市記錄方言，在北平就記北平話。三是由政府指派一個學術性的研究會，重訂方言的拼音格式。先從國語入手，可是同時必得考慮到別種方言，所以必得同時研究方言的拼音格式（至少應當包含廣州方言跟上海方言）。三是先在北平、長辛店、石景山的區域裏試辦推行拼音文字的工作，從此可以研究出一個可以推行的方式來，然後再

試辦一種拼音的方言報紙，編一部方言詞典。

據我看來，統一國語的夢想，一時只可以放棄。沒有各種**拼音的方言**做基礎，斷不能教中國人說一種共同的方言。幾年之後，中國的文字教育才能達到英國的程度，或是蘇聯在中央亞細亞希望能達到的程度。英吉利文在本國能統一到英倫全島跟愛爾蘭的北部。凡是受過學校教育的英國人，不論在英格蘭，在威爾司，都能說兩種話。威爾司人就能寫兩種文字。像瑞士那樣在語言文字上都採取「聯邦」式的，在中國恐怕不會通行，因爲不符合中國人的大一統的思想方式。這些都是將來的技術問題，暫時不必多討論。可是目標必需確定。在北方編的教科書必需用大衆話。那樣的大衆話的教科書，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在全國通用，那又是技術問題。總而言之，編教科書的工作得顧全雙方面，一是符合國策跟各區域的生活需要；二是要解決中國特有的語言文字的問題。這第二方面的需要並不比第一方面來得輕，並且更需要技術。可惜沒有多少人能了解他。

末了，請大學的國文系，中學的國文教員，以及研究歷史的，中國文學史的，不要着急。這一套話跟各位沒有多大關係。高中學生至少有一部分將來還得唸古文，大學生更不必說。研究聖經賢傳，甚至於欣賞舊文學，都有他的不可磨滅的價值。可是這三十年來在文言、白話中間搖搖掍掍的先生們得要考慮將來何以自處了。

就連這篇文章，我還是爲半新不舊的同志們寫的，並沒有對大衆說話。

「五四」與新文學

楊振聲

「五四」運動除了反帝反封建兩層重要意義外，他還有一個附帶的意義，那便是與新文學的關係。在根本上說，二者都是解放運動；在形式上說，「五四」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行動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是思想表現於語言的解放形式。新文學運動起於民六，起初還是白話詩與白話文的提倡，到了民八與「五四」運動合流，他的內容才切實豐富起來，他的力量才茁壯滋長起來，因爲他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目標與全國青年這支生力軍。假使沒有「五四」運動，新文學不會發展得那樣快，甚至不容易發展。反過來說，假使「五四」運動不得到自己的語言，而還用古文作工具，這運動便抓不住全國的青年與多數的人民。兩個運動的合流，才把思想、行動、語言都打成一片了，才能完成他們解放運動初步的使命。

時代的奔流，使一切都在新陳代謝中演化其生命。「五四」時代的新文學，若不能隨時吸取新生命並反映新時代，他本身就會變成舊文學。這可分爲工具，內容與形式三方面來看。

一、「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主要的是工具的改變。就是以現代的語言來寫現代的生活。這樣他才去掉了裝腔作勢，假惺惺的姿態，開始走向文學的眞實與生動。說他「開始走向」，因爲他並未能作到眞實與生動，這便是工具問題了。那時一般作家所用的語言，部分的來自舊小說、語錄、皮簧戲的對話、舊文學中的名詞，還有一些翻譯的語法；更大部分的是每個人東拼西湊的藍靑官話。眞是所謂不文不白，南腔北調的傢伙。當時這種百衲本式的語言，提來傳情達意，還勉强够用；用作文學的語言，可就有點乏味了。因爲他不是從民間生長出來的，他缺乏那點虎生生的勁兒，那般在紙上跳躍的語句。

民二十二三年間的大衆語運動，方向是對了；爲了缺少多數人的實踐，成功就不能普遍。新近看到從老解放區來的文藝作品在這方面確有了很大的成就。這

就說明了爲什麼那些作品能在民間流行，也更指明了文學語言所應努力的方向。當然，澈底的方言，常不能得到普遍的了解；但若經好的文學作品把這些方言帶到各處去，不也就是普通語言了嗎？要使文學的語言本身有生命，有力量，他必是某一種方言的應用與滋長。而文學語言的豐富，也就必是這些方言融鑄會合的大成。

二、「五四」時代新文學的內容，不容分說的是以資產階級爲對象，以個人的興趣爲出發點的。以資產階級爲對象，雖不缺乏優美的材料，但大體上這對象是沉淪的。這就不能不使文藝偏向於揭發與諷刺。以個人的興趣爲出發點，又沒有廣大的生活經驗，就流於感傷性的易喜易怒，以及身邊瑣事的描繪。故自「五四」以來，三十年中的文學，在暴露帝國主義與封建社會方面最顯出他的力量與成績，換句話說，他還屬於在破壞時代的產品，不是建設時代的產品。民十四五以來的革命文學，稍後的大衆文藝，以及抗戰時期的「文學下鄉，文學入伍」的口號，在理論與方向上說，都是正當的；而實踐却只能在以後的解放區中。這也說

明了必在實際生活中嘗過甘苦，才能在文學中反映實際。不是站在傍觀的地位與憫人的態度上，而是放棄了小我，在人民中找到了大我，找到了人民的問題就是自己的問題；找到了人民的志願就是自己的志願。只有文藝上的技術才是自己的，也如木匠、泥水匠的技術是自己的一樣。

三、至於文藝的形式，在「五四」新文學的發展初期頗傾向於鄙棄自己的文藝形式而採取西方的文藝形式。這形式的生疏，就使文藝不能與一般人民接近。抗戰時期才提出了民族文藝形式問題。但這問題的解決是有待於實例證明的。最近來自民間的秧歌，採用民間歌曲的戲劇，鄉土氣息的小說，民俗的年畫，民風的蹈舞，都以貼近人生而為一般人民所欣賞。文學史告訴我們，詩經、九歌、以及後起的小說、戲劇等，都是來自民間的。自民間帶來了生命與力量的文藝形式，常留有無窮發展的餘地。這裏也正指出文藝需要努力的前途。

於是，文藝的工具是人民的語言，內容是人民的生活，形式是民族的基調，他才能更有憑藉的更大胆的吸取世界文藝的英華，取精用宏的來豐富與提高自己的文藝的花果。這花果確是自己的，因為他的根子深深的生長在中國土地裏。

「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李大釗

勞 榮

李大釗這個彪炳千古的名字和「五四」運動是分不開的。這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在文化上是民族文化的復興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廣大的羣衆運動。

「五四」文化運動實際開始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新青年」雜誌的創刊。這雜誌在創刊之初，「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自由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民國八年的「新青年宣言」更明白提出了反對「阻礙進化而不合理」的一切舊觀念，提倡「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提出了科學與

民主的兩大指標，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

就在這樣一個文化運動中，第一次在中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之一就是李大釗同志。他是「新青年」的編輯同人，他在「新青年」上曾寫過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章，而「新青年」本身，到最後幾卷幾乎完全成了專門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雜誌了。

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出現，對中國革命運動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毛主席說：「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由於這種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贏得了一個新的領導力量，有了新的面目，使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掌握了中國革命這一個方向的早期的領導人之一，就是李大釗同志。

黎明期的曙光

李大釗同志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表了兩篇號召中國革命進軍的文章，指示了

中國革命應該抉擇的方向，那兩篇文章就是有名的「庶民之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在「庶民之勝利」中大釗同志指出：「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他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有政治的和社會的兩個結果。「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民主主義的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他更明確地指出：「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眞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

心。……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託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和平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像警鐘木鐸似的，李大釗同志在「五四」運動前夕對當時的中國宣告：「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吧了。布爾什維主義這個字，雖爲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又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新青年」五卷五號一九一八年十月）

這在當時是可以說黎明期的曙光，對大批資產階級代言人是一種巨大的壓力，那時正想用改良主義反對工人階級革命主義，反對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思想的戰犯胡適，荒謬地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講些主義」，就是針對李大釗同志底思想領導而發出的。

理論與實踐結合

李大釗同志一開頭就是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眞實的馬列主義者。從「北京晨報」的主任編輯起，他始終不懈地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一九一四、一五年的反對竊國大盜袁世凱的稱帝和出賣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醜行，李大釗同志是一個領導者，後來，由於許多青年學生的請求，北京大學聘請他當了經濟學教授和圖書館長以後，他更盡力傳播民族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李大釗同志和那時北大某些先進教授的這種辛勤播種的工作，就收穫了在中國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五四」以後，李大釗同志就從事更實際的政治活動了。「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各學校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組，並組織了共產主義的小組，準備創立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大釗同志是創始人之一，他是北方黨的唯一創造者和領導者，也是全國黨的堅强而優秀的領導者之一。」（「李

在這個時期，李大釗同志促進了孫中山先生的進步，使國民黨在改組綱領上明白提出了最有利於民族革命運動的三大政策，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階段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學生市民由於日英帝國主義爲了掩護奉天軍閥張作霖軍隊進攻天津，限期答覆撤廢大沽口一切防禦工事的無理要求，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李大釗同志就是這次反日運動的最主要的領導者。魯迅先生在「守常全集題記」中曾有過這樣出色的描寫：「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天，他也在羣衆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裏來幹什麼？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事實上，李大釗同志是在從容鎮靜地指揮羣衆退却。從魯迅先生這寥寥幾筆的速寫裏，我們活龍活現地看見了一個「進攻在前退却在後的勇敢的領導者、指

揮者」底鎮靜沉着的姿容。

這一種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鎮靜，是李大釗同志對革命事業忠貞不二的戰鬥精神的表現。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奉系軍閥由帝國主義指使逮捕他時，他這種精神表現得更明顯。李大釗同志的大女兒星華在「十六年前的回憶」中，寫那時的情形道：

「九號的早晨，母親帶了妹妹到兵營那邊的兒童娛樂場上散步去了；因爲天氣好，他們是與緻勃勃的走了，連早飯也沒有吃。

裏間屋裏，父親在黑色的桌旁寫字，我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短短的一段新聞還沒有看完，便聽到『嚓……』快槍發着尖銳的爆炸聲。緊接着就是庚子賠欵委員會那邊發出一陣紛亂的叫喊，又聽見有許多人從那列矮小的圍牆上跳到我們的院裏來。

『什麼？爸！』我瞪着兩隻受驚的眼睛向父親問着。

『沒有什麼，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的從抽屜裏

取出那支閃着光亮的小手槍，便向院裏走來。當我們走出房門時，看見許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羣受驚的小鳥似的東奔西撞，找不到適當的去處。我緊隨在父親的身後，走出這座充滿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間僻靜的小屋，暫時安靜下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面孔非常冷靜，手裏仍握着那唯一的武器；看樣子，如可能抵抗時，一定要抵抗一下。因此我也胆壯起來了。這不是可以偶然得來的，這是一種馬列主義者的偉大的革命的修養，是這種精神，這種修養，使李大釗同志「不只是慷慨激昂英勇的步上刑台，而且還作了最後一次演說，宣傳了共產主義眞理的必然勝利。」

慈父，導師，戰士

李大釗同志是河北省樂亭縣人，生於一八八八年（淸光緖十四年），死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二十二年前被帝國主義指使的奉系軍閥謀害了，然而一個李大釗倒下去，千千萬萬的李大釗就跟着站起來，跟着向前

戰鬥。今天，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正走向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絞殺李大釗同志的一切封建、買辦的反動勢力就要從中國歷史上澈底乾淨的消滅完。李大釗同志所歌頌所蘄求的「青春的中國」已經誕生，而且正在壯大。

這樣的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像其他偉大的革命者一樣，魯迅先生兩句詩可以充分表現他的人格、思想和做人的態度。那兩句詩就是魯迅先生自己的寫照：「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毛主席說：「『千夫』就是敵人，『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李大釗同志對敵人是毫不妥協，決不讓步的，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甘爲孺子牛」的李大釗同志，是一個慈祥的父親；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青年導師；廢餐忘食，傳播眞理的文化工作者；堅持戰鬥，臨難不投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驅。

這樣的一個「孺子牛」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模樣呢，魯迅先生描過一幅素描：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有很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的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守常全集題記」）

作爲一個父親，他「永遠是慈祥的，從沒有罵過我們，更沒有打過我們。我向來愛對父親發着許多無意識的問題，無論他怎樣忙，對於我的愚問，總是很感興趣的，耐心的講給我聽。」（星華：「十六年前的回憶」）

他對艱苦的革命事業是永遠抱着樂觀的，在反動黑影一天天濃重的被捕前幾天，他更加緊工作，並不發愁或灰心，而且在工作餘暇，還時常對一家人說些惹人發笑的話。

在他的朋友和妻子勸告他離開北平時，他堅決的對她說：「不是常對你說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平的，假如我走了，北平的工作留給誰領導？這裏馬上就會垮台！」

李大釗同志的模樣，魯迅先生還有幾筆描寫說：「在厦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鬍子，藍布袍，黑馬掛，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守常全集題記」）

這些，似乎很足够幫助我們今天認識李大釗同志的儀表了。這種儀表，也充分幫助了我們理解他高度共產主義者的氣節和操守，他一貫爲在中國實踐馬列主義革命理論而堅決奮鬥的原則精神。這種氣節操守和原則精神，和他的遺文一同，將永遠活在世世代代人民的心裏。

「五四」——中國青年節

揚　公

「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以後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這一運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及中國學生愛國運動的高漲而趨於成熟。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西歐帝國主義國家都捲入這次混戰的漩渦，無形中放鬆了對於中國的侵略，而日本則乘機向中國展開激烈的進攻。那時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封建軍閥袁世凱竊去。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之下想作皇帝，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大戰結束，各戰勝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舉行分贓性質的和平會議，討論如何分割戰敗國的利益，當時中國政府派去陸徵祥等五個代

表參加，提出有關維護中國權益的要求，但巴黎和會不但對中國提案置之不理，而且把解決山東問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二十一條則不予討論。和會失敗的消息傳出以後，法國留學生首先反對在和會上簽字，接着北京學生也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下行動起來，提出「拒絕和約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行動方針。五月四日，北京五千餘學生在天安門舉行盛大的集會，遊行示威。並以懲辦親日分子賣國賊曹汝霖（交通部長），陸宗輿（幣制局總裁），章宗祥（駐日公使）等爲目標，羣情憤怒，將章宗祥加以痛打。並包圍趙家樓，搗毀家具，火焚曹汝霖的住宅。當時反動政府却採取鎮壓手段，派大批軍警逮捕學生數千人，北大學生郭欣光竟被打死，反動面目完全暴露。於是各地紛紛響應，罷課罷市，排斥日貨，掀起巨大劇烈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五月六日，北京成立學聯會，上海成立了全國總學聯，各界團體發表通電，散發傳單，請願者絡繹不絕，運動達到洶湧澎湃的頂點，連當時的資產階級也捲入了這個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反動政府在羣衆運動的壓力下感到恐懼，被迫罷免曹、陸、章等賣國賊，

並拒絕「巴黎和約」的簽字，通電全世界。當時舉世震動，使帝國主義國家大吃一驚，而這一石破天驚的偉大運動，正是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五四」時期的青年一代創造的。

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幾年，中國已經開始了「學校與科舉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的新文化運動，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提出「民主」與「科學」的兩大改革，才肯定了這一運動的性質——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一運動，爲以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北伐）打下基礎。同時由於工人羣衆的參加，更加有了嶄新的內容。中國共產黨便是在這個運動中發展形成的。在文化方面，廣大羣衆如狂潮洶湧，提出改革舊政治，發揚民主精神的要求。並且提倡科學，介紹新思潮，揭出反對封建迷信及舊禮敎的旗幟，使這一運動普及到社會的各角落。各種通俗報紙、叢書、刊物，如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進步的社會科學理論也開始了有系統的介紹。中國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礎。中國的新青年由於國內羣衆運動、愛國運動偉大力量的感染，由於看到蘇

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工人階級的英勇，便追求着改造中國的道路。而當時作爲新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魯迅等人，都是這一運動的領導者。「五四」運動是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準備，而且很快地便進入政治鬥爭的狂風暴雨的時代了。「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

英勇的旗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的青年們站在革命鬥爭的最前列。抗日戰爭後，一九三七年中國青年聯合會成立，爲了繼續發揚「五四」的革命鬥爭精神，就規定這一天爲「中國青年節」。

北平學生是富於鬥爭的傳統的，從「五四」到「一二九」以及抗戰勝利以後的援助沈案運動，反饑餓運動，「七五」運動等，無一不表現了高度的革命鬥爭的熱情，贏得社會及國際的同情和欽敬。

現在北平解放了，作爲「五四」和「一二九」策源地——同時是新文化運動和抗日戰爭發祥地的北平，及富於鬥爭精神的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必須會繼續已往的優良傳統，爲新的更廣大的革命鬥爭和社會建設付出力量來。

今年「五四」話法律

費青

「五四」一向被尊重爲我國文化史上一個大節日，但是它和學法律的人好像沒有特殊的干係。法律教育界的學生和教員，因爲還處身在學校裏，而「五四」正是由學生和教員所發動的一個運動，所以他們對於「五四」當然也應當以一般學校中人的資格來紀念。但是，「五四」對於他們所學的專門學術——法律——好像始終沒有多大干係。這樣一種「好像」如此的感覺，固然膚淺短視，因而失實，但在今年這「五四」以前，確實也有促使一般人如是感覺的原因。

三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個劃時代的大革命。它的意義深遠而廣大，它不僅是文化的，而且是政治的、社會的，它撼動了中國整個社會的任何方面和任何角落。在它以前，中國祇有改朝換代式的革命，在

它以後，革命纔走上眞要使老百姓獲得解放的正確方向。共產黨誕生了，工農醒覺了，國民黨也曾一度由孫中山先生領導而走上這個方向。但是歷史的進展是迂迴曲折的，在一九二七以後政權落入反革命的封建買辦集團手裏，誕生於「五四」的革命精神，從此經受了無限的艱苦鍛鍊，除了在中共邊區它已能具形爲軍事政治力量外，在大部分的其它區域，它祇能發爲學生運動文化運動等形態。

法律原也是社會制度中的一種。像「五四」這樣一個深遠廣大的革命運動，它絕不會不撼動了法律這一社會制度。我們祇須一看那時中共邊區所有的司法以及所施行的法律怎樣和其它地區絕對不同，就能了解眞正澈底的革命正是在法律方面表現得最顯著。可是，法律這一社會制度却必需藉政治力量做後盾，纔能具體化。因此，當革命尚未到達已經取得和鞏固政權的階段，它就不會表現於法律。相反的，這時的法律正會是反革命政權用來壓迫革命力量的工具。我們可以說：一九二七以後，封建買辦政權的重用法律作爲一種鎮壓異己的利器，反而指出「五四」革命精神在艱困磨鍊中正有着飛躍的生長。簡言之，反動法律的加强是和

革命力量的長成成爲正比例的。一旦反動政權頒佈了最蠻橫的「戡亂法」，我們很能預卜解放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今年這個「五四」是對於學法律的人具有特殊意義的。在這天我們纔看到三年前「五四」所誕育的革命精神如何撼動了法律這個社會制度。它不祇撼動，甚至把反動政權的整套法律——六法全書——全部推翻了。革命力量的長成中，起初促使舊法律加增其反動性，到了一定發展階段，再使它整個消滅，這是歷史辯證發展的一個好例。從今年這個「五四」起，我們不會再錯認「五四」對於法律沒有干係。我們正看到這干係還比了對於其它社會制度來得強烈深切。法律系的同學和同人們不是正感到「法律系怎麼辦」的嚴重問題麼？這個嚴重問題却正是三十年前「五四」革命運動所已經提出，等到現在纔被我們看清楚。我們還能說：「五四」對於我們沒有干係麼？

「法律系怎麼辦？」其實是「法律怎麼辦？」六法全廢止，並不是說就此「無法」。俗語說：「無法無天」。祇須「有天」就不會「無法」。蔣政權時代「無

天」，於是雖法如牛毛，而其實還是「無法」。現在我們有個大是非，大目的，我們已有了「天」。從這裏，「法」就會逐漸產生。我們這輩現正嚷着「法律系怎麼辦？」的法律界中人，個個會成爲「法」的逐漸產生的接生婆。那時我們會忙得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正像任何接生婆一樣地忙。

——四月三十日於北大圖書館研究室

不斷的進步

葉聖陶

「五四」是我國現代史上青年運動開始的標幟。這個運動所號召的，積極方面是科學跟民主，消極方面是反帝反封建。如果只是少數人的理想，決不能夠發動這麼一個運動。必然由於客觀情勢上有它的必需，才會一經號召，就展開成爲廣泛的運動。所謂必需，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中國人民必需生活得好，物質上精神上都好，而且好沒有止境，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年要比今年好，這個必需帶來了另外一個必需，就是中國必需成爲獨立自主繁榮康樂的國家。實現這兩個必需是目標，科學、民主、反帝、反封建是途徑或方案。「五四」以後歷次的社會運動，以及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種種方面的表現，雖然不見得完全一致，可是大體說來，都順着這一道主流在那裏進行，就是遵從上面所說的途徑或方案來達到

上面所說的目標。誰不順着這一道主流甚至阻擋住這一道主流，大家就說他反動或者反革命，反動反革命分子是人民跟國家的敵人，因爲他不讓人民生活得好，不要國家獨立自主繁榮康樂。

若問誰是這一道主流中的主力，那必得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把科學的哲學作爲思想的根據，實事求是，土生土長，制定了種種的綱領跟政策，而且即知卽行，行中求知，把理論跟實踐攪和成渾然的整體，到今天爲止，你看，大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全解放了，大江以南正在逐漸解放。人民翻了身，建立了民主政權。生產跟建設成爲人民熱狂的中心問題，盡量的利用科學，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在解放了的廣大區域以內，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勢力已經一掃而空。所以，「五四」當時所號召的科學、民主、反帝、反封建，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跟努力，經廣大人民的擁護跟奮鬥，才澈底化爲有血有肉的現實：這樣說法是最爲確切公平的。

三十年的時間，在歷史上說起來，眞是短短的一段兒，可是進步就有這麼

多；我們怎得不非常之興奮？再想想未來，全中國的解放在最近期間就將實現，在全國人民的勤勞跟熱忱之下，生產跟建設必將先於預期而逐步完成，人民的生活沒有止境的好起來，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强固的站定在東亞，那進步比今天更多了。進步，不斷的進步，是咱們該拿來自勉並且自傲的。

「五四」運動的回憶

鄧穎超

一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我才十六歲，正在天津女子師範念書。今天談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時間和中國革命的曲折複雜經歷，已經冲淡了我的許多記憶，現在僅就我能記得的談談：

那年五月四日，北平學生發動示威，要求「懲辦賣國賊」「拒簽凡爾賽和約」，學生們在激憤中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怒打賣國賊的事件，在次日消息傳到天津，震動了天津各校的同學，紛紛議論。立即響應北平同學的愛國運動，在七日天津學生就舉行了示威，很快的組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以女校同學為

主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當時我們只憑單純的愛國熱情，喊出的口號除了前面說的兩個以外，還有「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不做亡國奴」等等。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採取鎮壓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彈、水龍掃射、毆打以至逮捕等各種辦法壓迫學生。我們在鬥爭中鍛鍊，逐漸提高了覺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的湧入古老的中國，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開始在中國青年中起了影響，這就給了「五四」運動以新的進步因素，使之向前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質，但當時，在我們的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明確的指出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們的認識也才逐漸的明確起來。「五四」時，我們也不知道「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只知道列寧是蘇聯革命的導師，他是要為被壓迫的工人和農民謀解放的而已，不過我們當時的確也有一種自發的直覺認

識，要救國需要衝破學生的圈子，救國不能單靠學生，必須要「喚醒同胞」。所以，我們很重視宣傳工作，組織了許多講演隊。我當時就担任着「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和「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我們的講演隊定期的經常的到各處講演，在初期女學生因受社會封建習俗的束縛還不能和男學生一樣的出現在街頭講演，而是限於在市內各宣講所、民教館，以及公共集會的場合來講。每次聽講的人都很多，我們講的是要大家起來齊心救國，要達到懲辦賣國賊的目的，講述朝鮮亡國後，當亡國奴的慘痛，我們應有愛國開會的自由，抗議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壓迫等等，我們講的人，有時聲淚俱下，聽的人也很受感動。另外我們還作家庭訪問，常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挨家宣傳，有的人家，對我們很熱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門一關，拒我們于門外，但我們碰了釘子一點不灰心，還是挨家敲門訪問。記得那年暑假期內，有一次出發去天津西頭講演，回來時趕上傾盆大雨，每個人淋得和水鷄子一樣，但同學們一點也不洩氣。下次還是按時照樣的去幹。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重視文字的宣傳和報紙的作用，由一天

津學生聯合會」出版了三日刊的「學生聯合會報」，後來改為對開一大張的日報，和現在人民日報的篇幅一樣大。每期銷到二萬份以上，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個報的主編人就是周恩來同志。「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出版了一個週刊。這兩個報紙報導着當時國內外的時事消息和全國各地的學生愛國運動消息及反壓迫的鬥爭，還有社論和政治性的論文及文藝作品等等。

二

關於「五四」運動中，學生要求民主和科學的具體事實，我只能從當時天津一個地方的情況和我所活動的一個角度上，舉幾個例：

由于反動的北洋政府，對外媚日，對內袒護國賊，不斷的壓迫學生，我們沒有愛國的自由；當時我們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權利。我們為此遭受過多次的壓迫，也作了多次的鬥爭。例如「五四」那年的雙十節，由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天津全市市民大會繼續堅持懲辦賣國賊，

能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加緊抵制日貨，舉行遊行示威。在事前我們已經風聞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外號叫楊梆子）準備以武裝解散我們的集會，阻止我們的遊行。但我們毫不恐慌害怕，我們也作了應付武裝警察鬥爭的準備。會場的佈置和隊伍的排列是把市民們站在主席台的週圍，然後把有組織的學生站在市民的外圍，又把女學生站在最前列，準備被武裝包圍時先由女學生衝出重圍，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拿的旗子，都是用專買來的堅固竹竿製成的，準備把竹竿作爲事變發生時鬥爭的武器，在預訂開會時間以前，市民和學生的隊伍大羣大羣的向南開廣場集合起來。果然不出我們的預料，警察們大批出動，把我們整個的會場包圍起來了。我們仍按開會的秩序進行，直到遊行示威開始時，我們就和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首先我們學生向前衝，一面衝一面向他們宣傳呼號「警察也應該愛國」，「不要打愛國的學生」，同時因爲他們已經動武，用槍托毆打我們，很多同學挨了打，有的眼鏡亦被打破了，於是我們也就揮動手上的竹竿抵抗，並用竹竿把他們的帽子撥掉地上，當他們彎腰去拾帽子的時候，我們就乘這空隙向前衝

衝，正在搏鬥緊急的關頭，來了一枝外援的隊伍——恰巧學聯的汽車宣傳隊開到會場，裏外夾攻就打開了一個缺口，大隊跟着汽車衝了出去，於是環城示威遊行，直到警察廳，質問楊以德，向他提出抗議，一直堅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學極大的憤慨，於是不再管封建習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頭，不顧一切，到處舉行街頭露天講演，控訴楊以德對於學生的壓迫。

在雙十事件以後，壓迫愈來愈緊，過了一個多月，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被查封。馬千里、馬駿等二十四個領導人被逮捕。緊接着天津學生聯合會被查封，我們不能公開活動了，於是就轉入租界，在一個同學家裏借了一間小屋繼續辦公，堅持鬥爭。在十二月中爲了要求啓封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學生會，釋放被捕代表，發動了全天津同學的大請願，包圍省政府要求當時的省長曹銳出來答覆，但他避不出見，我們推舉代表去見他，而省府大門早已緊緊關閉，不準代表進去。我們的四個代表——周恩來、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從大門底下的門坎洞裏鑽了進去，一進去就挨了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學生大隊更加氣憤，堅持不走，直

到半夜、反動的省政府又拿出最後的手段，用刺刀、槍托、水龍來武力鎮壓，驅散了學生，演出了流血慘劇，很多同學挨打受傷，頭破血流，重傷的送入了醫院，從此我們更認識了反動政府的猙獰面目，認識了愛國自由和民主權利，決不是不經過鬥爭和流血，就能輕易得到的。在「五四」運動的第二年，也就是運動的後期，我們的工作重心轉入了反對非法逮捕，營救代表，要求轉送法院公開審判，爭取輿論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全體先後被捕的代表二十八人才得到釋放。

我們不但在校外受反動政府當局的壓迫，在校內也受校長教員的壓迫，禁止我們出校活動、參加會議。例如在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七日，我們女師同學爲了參加「五七」國恥紀念大會，與學校當局發生了衝突，雖然出去開了大會，但回到學校時，校中已掛出牌示，竟公佈將全校二百多同學全數開除學籍。我們氣極了，一點也不害怕，決不屈服，大家一致廢寢忘食，連夜收拾行李，全體搬出學校，但學校當局反關起大門不準我們走，把電話室也封鎖起來。全校騷動，鬧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清早，還是全體堅決搬出了學校，我們避開警察的監視，到郊

外種植園一帶去召開會議，鬥爭堅持了一個星期，終於在家長和社會輿論支持之下，迫使學校當局收回成命，先收回了開除我們的牌示，然後我們全體同學才勝利回校。

我們當時，雖然還不知道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但是有滿腔的愛國熱情，爲了救國，爲了民族的獨立，爲了爭取民主自由，有犧牲一切在所不計的精神。

三

隨着「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同時掀起了婦女解放運動，這也是「五四」的民主運動中一個主要內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學開女禁、各機關任用女職員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學分別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合併，共同工作。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學中也有不贊成的，有顧慮社會輿論不同情的，有怕合併後被人說男女混雜鬧笑話的，但男女同學中的進步積極分子終于衝破了這些阻

礙，勇敢的實行合併並收到良好效果。當時男女同學間的相處都是極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國，忙鬥爭，在工作上競賽，女同學不肯後人。女同學中的積極分子明白自己要作開路的人，就不能遺笑社會，擋住了後來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幹，作出一個榜樣來。在當時男同學中的積極分子，受了新思潮洪流的激盪，重男輕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對女同學都很尊重的。在工作的責任上，都是平等担任。學聯會各部門的負責人，有一個男同學也必定有一個女同學，學聯會評議部的主席也是男女各一。天津女師的同學，當時在學聯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和南開同學一樣帶有決定性的。當時北平男女學聯會的合併晚于天津的學聯。他們很羨慕我們天津學聯的合併和我們工作的良好表現。那時阻止北平男女學聯合併最頑固的分子，就是當時女師大學生會的控制者陶玄——婦女界的敗類，她早已投靠了反動的國民黨，直到現在仍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活動。

四

由於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和新思潮的輸入中國，隨着「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新文化運動愈加蓬勃發展起來，這是「五四」「科學」口號下的主要內容。在北平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等刊物，被很多同學所喜愛閱讀，爲了提高我們對新文化的學習，由天津學生聯合會于每週舉行學術講演會，請北平前進的教授如李大釗同志等到天津講演，反對文言反對八股，提倡用白話文，學習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用法。這些事在今天看起來是很平常無足道的。但是在那時，這些事却是極新鮮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們男女同學中比較進步的積極分子二十多人，感覺需要一個比學聯的組織更嚴密一點的團體，更能作一些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組織了個小團體——「覺悟社」。這個團體的社員常在一起談論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時我是年紀最小的一個，不常參加正規的討論，但常聽到比我年長的男女社員們談論着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

主義等等，大家都還沒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產主義，只聽說最理想的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寧，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們的革命是把多數被壓迫者解放了，要實現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和對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時，我們還得不到這類問題的讀物啊！「覺悟社」的生命不很長，只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在前面提到的包圍省政府慘案發生以後，一部分社員被捕入獄（如馬駿、周恩來等），一部分社員在學校畢業後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數人也因爲環境惡劣不能作什麼活動。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一部分社員如周恩來、郭隆眞出獄後，很快的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和其他社員也從學校畢業分到各地，我們的小團體，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還經常來往，有的通信聯絡，在一九二〇年有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一年有了中國共產黨以後，我們二十多個社員中有半數以上的人都先後加入了黨或團。有的還成爲黨或團的某些地方組織的第一批成員。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成立的，後又成立了黨的組織，這時我們已經明確的知道了什麼是

無產階級，要爲無產階級的利益奮鬥，確定了我們的信仰和奮鬥的目標是共產主義。

「覺悟社」的二十幾個社員，三十年來，變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圖個人的安逸已不問政治，有的人，已墮落跑到反動國民黨的營壘中去了。但有的人是站在光榮的共產黨員的崗位上英勇犧牲了。如當時最優秀的學生領袖馬駿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時被張作霖逮捕殺害，郭隆眞同志，（後改名郭林一）于一九三一年在青島被捕，解往濟南被韓復榘殺害，他們二人臨刑時，高呼口號，唱國際歌，英勇就義。還有天津另一個先進學生小團體的社員于方舟同志在土地革命時期領導玉田暴動而犧牲。提起他們不禁引起了我對他們和無數革命烈士們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滿着對敵人的仇恨，我們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跡前進，中國的青年，要繼續「五四」的精神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一定能够完成「五四」運動所開闢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勝利的前進到共產主義。

（宜記）

回顧與前瞻

俞平伯

「三十年爲一世」、從民八「五四」到現在，時間不爲不久，但我們住在北京的人覺得人民無恙，城郭依然，回想起來彷彿如同昨日。每逢「五四」，北京大學的同學們總來要我寫點紀念文字，但我往往推託着，延宕着不寫，因爲我雖曾參加了一點兒的「五四」，却不過一名馬前小卒，實在不配談這光榮的故事。況且過去的已過去了，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爲一世值得紀念，大時代的確已到了。馬前小卒還是馬前小卒，或者更小了一些，但挨着這大時代的邊緣，彷彿亦很有光彩的，老話所謂「與有榮焉」，這「五四」的精神也在突變的、雄偉無前的革命中發揚光大起來。這是從民八以來最可紀念，最促人民反省的一回。

種我雖不懂什麼，也不得不就想到的說一點兒。

民國八年的五月四日，這個青年學生的運動，從表面上看，因爲抗爭辱國的外交以直接行動打擊北府的官僚們，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廣泛，是社會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簡直可以說包羅萬象，不過在尖端上作一個政治性的爆發而已。所以這個運動發生在北京以後，立刻風靡全國，展開了如火如荼的陣容。在今年全國大解放以前，這三十年中很少有過這種偉大令人感動的場面，就是民十七的北伐成功，也還差一點。

再說一句，這兩個劃時代的轉變，實只是一樁事情的延長引伸，不妨當作一本戲看。這很有點像做截搭題的文章，但我的確如此想的。例如共產思想已在那時萌芽，李守常先生一面作「五四」的鬥士，一面又是共產主義的先覺和殉道者。魯迅先生的「吶喊」也大部分在那時候寫的。科學和民主可不是還是那科學和民主？就思想的輪廓上看，新民主主義以至於共產主義，和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時所倡導的沒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在它的實行。「五四」當時氣勢雖

然蓬勃，但不久內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動殘餘勢力的壓迫，這些人們雖然想做，要做，預備做，却一直沒有認眞幹；（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在被中共同志們堅苦卓絕地給做成了。這大時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實行上，思想領導的正確性當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開了一張支票，當時看來很像空頭支票，却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給兌了現，像我在北京約略住了半輩子不會移動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來，自然很像奇蹟。

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號標語等原都很正確的，至少在那時候是這樣。如「內除國賊」不就是「反封建」「懲辦戰犯」嗎？如「外抗强權」不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嗎？可有一層，這三十年中却幾度迷了路途。尤其在這古城的大學裏，雖亦年年紀念「五四」，但很像官樣文章，有些朋友逐漸冷却了當時的熱情，老實說，我也不免如此。甚至於有時候並不能公開熱烈地紀念它。新來的同學們對這佳節，想一例感到欣悅和懷慕罷，但旣不曾身歷其境，總不太親切，亦是難免的。再說句老實話，近年來各校同學們這些反抗强力，爭取光明的活

動，已邁過了「五四」的成績遠甚，只是民八的五月正當時代轉捩的關鍵而已。北大的精神只有一個，何必「五四」，又何必不是「五四」。

舊路雖迷，忽然找着了，前景更有新開展，驚喜慚愧的心情如何可言，我們總應當好好的走着罷。也正賸得這「開步走」的問題。革命的前途，猶艱難而遙遠。俗語不說嗎，「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惟其艱難，惟其遙遠，那才更有意思哩。最所欣幸的，光明在前，咱們從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三十八年五月北平北京大學

「五四」三十年

魏建功

我家鄉蘇北有句俗語：三十年河東變成河西。這一句意思說社會的變遷，三十年可以有個大不同。對於「五四」給我們的認識，深深地感到所謂河東變成河西的意義。這意義使我發生極高度的警悟。

我正是「五四」那年秋天進大學的一個青年。那時候我完全被「新」的思想潮流所動盪了，回想一切事物，只深深記得對凡是「舊」的都起了一種極度懷疑檢討的態度。大家在尊重個人自由的空氣裏，摸索新的道理。道理只是道理，三十年光陰就算一世了，只落得個「要去掉舊的希望新的到來」的空想。仔細檢討，完全是消極的破壞的衝決網羅的狂熱。這狂熱固然掀起思想改革的浪潮，却表現了單純無方法無組織。

「五四」前後大家都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時期。三十年後的今天說起，那算有什麼新的具體的文化？新的不出來，舊的不會去。三十年間究竟是進步了，進步在舊的沒落新的孳長的鬥爭過程裏。我們有許多人浪費了精力瞎摸索，却有許多人偉大地犧牲了生命勇敢創造，更有許多人胡塗墮落地阻滯着這一新文化建設的進行在胡作梗。擺在我們面前的教訓是：

無方法無組織只有失敗；

只有方法和組織的形式還是失敗；

有方法有組織而把自己往天上鑽，做「象牙之塔」的夢，或是造成許多「優越感」，更是失敗。因此「五四」的劃時代無疑地把舊的面具揭開了，但從這些教訓裏，我就親身看到若干揭穿舊面具的倒又被人揭穿他僞新面具。

「五四」時期所要推翻的舊面具，與後此三十年中逐步所要摧毀的僞新面具，形式姿態不同而其反動消極作用則一。一個是封建的，一個是買辦的，合起來成了個又封建又買辦的。這些事實太多了，總括起來說，一種是做古老的奴隸，一

是做洋人的奴才。我們幾乎繼續了辛亥以前滿清時代的「媚外」而更加「迷外」了。「土包子」站着跟「洋少爺」一比，怎不「自慚形穢」？三十年了，今天該檢討，我們誰是胡作梗的？誰是瞎摸索的？誰是勇創造的？

今天是河東變成河西的日子了。三十年前只是一種革新的意識在喧嚷，而一羣羣瞎摸索的碰着了胡作梗的就停滯着不得向前，甚至於引入了岔道。事實是鐵一樣硬朗，畢竟今天是河東變成了河西呀！這我們得相信那革新的意識裏一定還有個力量在潛伏着的，使得一羣羣勇創造的針對住胡作梗的不斷地鬥爭了。這力量宣示出有方法有組織，不會做「象牙之塔」的夢，毫無「優越感」，拚命向地下扎根的精神，眞的「五四」精神一脈綿延下來，到今天成功了個「舊的已去新的來到」的「新民主主義」。

我拿寫這篇短文的日子的回憶中一件小事做這種意識演變的時間標記，在北平第一次紀念「五一」是二十九年前（一九二〇）的今天，我記得那年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的幹事拿着紙旗，運了一卡車饅頭送給街上洋車夫一個人一個，饅頭上

印了幾個紅字　記不清了，也許是「勞工神聖」。二十九年後的今天，我正寫到這裏，聽著街上工人羣衆扭秧歌慶祝自己的節日。過了二十九個年頭，「五一」紀念的形式從學生布施苦力的意味確已河東變成河西了。然則我們對「五四」三十年給我們的認識裏，該如何深刻了解意義而加以警悟呢？

檢討過去，可憐摸索的人，改造了三十年，縱未滅亡，已屬落伍，偏重個性，離羣閉塞，只知道消極不滿意，而忽略了積極建設工作。浪花上的泡沫既不是，水脚下的渣滓也不是，想做澄清的白礬，却成凝固的膩鹹能不警悟嗎？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北平

紀念「五四」的第三十年

羅常培

咱們今年紀念「五四」，含有三點重大的意義：

第一、「五四」是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啓蒙運動，如今不單「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國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犧牲了若許頭顱鮮血，人民受了千辛萬苦，所換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來，這的確是自有「五四」以來第一件痛快事！咱們應該怎樣鼓舞興奮？怎樣熱烈慶祝？

第二、今年已經是「五四」的第三十個年頭兒了。照「三十而立」的老話來說，咱們不該再縈廻着當初啓蒙時代的幾個老調子，而不想建立更成熟、更適應時代需要的新企圖。換言之，「五四」的童蒙期已經過去了，從今以後便是「五四」的成年期。成年期所應避免的就是童蒙期的幼稚病和浮誇病。比方說，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的被推崇，一般人向來承認是「五四」精神的表

現。可是咱們認眞檢討一下，這三十年來，國人對於科學的貢獻究竟有幾樁能發揮民族自己的智慧，適應人民大衆的需要？對於民主，有很多人也是崇尙假民主，以資產階級的假民主爲裝飾，而不能澈底了解，並推進，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自然我不是說，這三十年來咱們沒有値得尊重的科學家和革命家。相反的，我知道咱們確有一些恪守崗位的科學人材，埋頭實驗室裏得到獨立自發的貢獻；更有無數身體力行的革命志士，與廣大的工農羣衆相結合，不惜摩頂放踵的犧牲自己去爭取人民大衆的福利。可是，也仍有一些只是口頭叫喊的，不是實事求是的；言論民主，行爲不民主的也不乏實例。這種幼稚病是成年人所不該有的。所以「五四」初期的一些口頭禪，到現在有的已然失去時效，不能再空談而不實行了。

第三、「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一九一九），世界上的政治思潮也五光十色放出了不同的光芒。舉其重要的來說：那一年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孫文學說和建國方略，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第三國際開成立大會於莫斯科，而同時意大

利的法西斯蒂也開始組織。俄國十月革命在它發生的前兩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它發生的後兩年。從歷史的推演來看，當時思潮紛歧的現象，可以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經這三十年的事實證明，咱們可以認識，各個思潮間的外部衝突，和每個思潮裏的內部矛盾，都是促成他們運動和發展的淵源。發展的結果，反動的終歸於消滅，合理的也沒法兒遏抑它的欣欣向榮。本着鑒往察來的方式，咱們可以說，「五四」到了「三十而立」的這一年，大家確已把握着可以「立」的主義；找到可以遵循的坦途。假如還有個人或國家違反了這種合理的思潮，爲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而違反了人民大衆的需要，那麼，歪曲孫中山主義的蔣介石，倡導法西斯蒂的墨索里尼和執行納粹主義的希特勒，都是他的前車榜樣！

魯迅先生曾說：「『五四』的老調子不能再彈了！」沒有「五四」咱們不會有現在；永遠膠執着過去的五四精神，咱們也不會有將來。「五四」既然到三十歲了，咱們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氣魄來，不要憧憬過去的光榮，必須企圖未來的創造！

「五四」回憶

劉清揚

一個劃時代的文化革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啓蒙運動，是由北京（當時仍稱北京）的青年揭其序幕的。在猛烈爆發的反帝反封建英勇奮鬥的號召之下，於是津、濟、寧、滬的青年繼之奮起。未幾瀰漫到全國的工人、學生各界，以及婦女，即團結築成國防堡壘。至今已歷三十年滄桑風雲的巨變，革命狂潮起伏的驚險，凡是身經百戰的鬥士們，總不會遺忘此人民革命的壯舉，是由於大無畏的青年們，首先舉義的。

「五四」運動後，又經歷了「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及人民解放戰爭的各個革命時期，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始終與廣大人民在一起，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

治，以堅決徹底革命絕不妥協的精神，英勇犧牲，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奮鬥到底！到卅年後的今日，竟以歷史空前的人民解放偉大勝利，來慶祝這一光榮的紀念日，不但足以使站在人民前面的領導者，値得欣慰！尤足告慰於各時代爲人民革命而犧牲的先烈，永遠含笑而安息。只有被無情的歷史所淘汰的落伍者，應該反省和慚愧！但在今天而回憶過去，對於筆者自我的批判檢討，也更有深刻的警惕和敎訓。

從民國初元年間，因爲辛亥革命的結局，是由專制的滿清，調換了一個封建共和，於是竊國大盜袁世凱爲滿足他作皇帝的野心，不得不求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借債，因而暗訂二十一條亡國的條約，因此已使有志青年在憤恨和憂慮！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帝國主義於分贓的巴黎和會之中，威逼中國承認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在將喪失國家主權的緊要關頭，才使忍無可忍的北大學生，爆發了怒打賣國賊曹、陸、章和火燒趙家樓的壯擧。這一反日高潮，隨卽激起全國各界人民的愛國熱心，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軍閥的怒吼之聲，遍於寰宇。

在北京又接連着，爲要求拒絕巴黎和會簽字，取消二十一條反抗山東省長馬良槍殺愛國遊行的人民，遂由京津學生共同舉行了兩次大請願。當時的賣國政府，正是親日的安福系在當權，第一次的請願，在懷仁堂見到了徐世昌，因在衆代表的威逼之下，他不得不應許，去電巴黎，使出席和會的代表拒絕簽字，這實是出乎帝國主義意料之外的打擊。第二次爲要求懲辦馬良竟在新華門前聚守了兩日，不但未接受代表的要求，並把四十餘人，全部逮捕。當時的警察總監吳炳湘，竟有意槍斃這些代表，因而激起京、津青年的憤怒，卽發動了三萬學生對警察局的大包圍。爲要求釋放被捕代表，不達目的不肯散去。其中唯一青年領袖馬駿，成了團結三萬青年的中心。反動政府，也動員了全城軍警，把三萬學生驅逐到天安門內去，專以逮捕槍斃馬駿，作爲驅散羣衆的威脅！果然大家爲愛護馬駿，才不得不散去。不久被捕代表也得開釋，這便是第一次團結奮鬥力量的勝利。

在京津以及全國各地的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女界聯合會等，作了多次

羣衆示威，街頭講演，集體請願的偉大場面之後，於是便進入全國有組織有系統的兩大鬥爭主體。首先由北京學聯會，派代表到上海發動成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由於各省市都已有了基層組織，再號召成立全國大團結的組織，當然是很容易的。所以不久全國一致，堅固團結的全國學聯總會即成立。此後一切鬥爭，均由常務理事策劃主持，所以鬥爭的精神更爲堅强，前進的步伐是整齊的。運動一直延長到年半之久，並曾派代表，去南洋各地作宣傳呼籲，博得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和協助，直到取消二十一條，運動方才停息。從這一抗日行動，才使帝國主義者，認識了中國人民團結奮鬥，堅決不屈的毅力。

上海全國各界聯合總會，是由天津各界聯合會推派代表赴滬號召組成的。天津各界聯合會，是包括工人、學生、婦女、教育、新聞各界，以及基督教會和紳、商等，所組成最健全完善的人民團體。所以它成爲推動上海全國各界總會的主力。由於全國人民愛國熱心，凡各省市都有各界聯合會的組織。所以各地推派赴滬出席大會的代表，有二百多人。這一民族長城的建立，其由上而下的領導，

實是由下而上集中的力量，可以說是中國史無前例的人民大團結，由於羣衆主動堅決的鬥爭，才能扭轉巴黎和會時對於中國不利的和約。

全國各地婦女的愛國團體，名稱不一，如北京的女學生聯合會，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上海女界聯合會等。婦女團體沒有全國總會，是依其組成分子，如女學生會或女界聯合會，卽分別係屬於全國學聯，或全國各界總會。但其奮鬥的精神意志，英勇努力的熱情，到處都是一樣的。尤其在廣大人民請願的行列之中，婦女總是居於前列，爲防止或抵禦軍警兇恨的打擊，不但作衛護男性的先鋒隊，而且其能力，勇敢，以及策劃行動，無不與男子並肩，共同努力！尤其中國婦女運動之深入羣衆中，就是在「五四」時期開始的。

「五四」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以及各界人民的擁護響應，那種精誠團結，互助合作的精神，實是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武器。當時的知識青年，原是主力的領導者，由於他們不脫離羣衆，注重團結各界的作風，是最正確的，所以才形成了不可侮的戰鬥力。雖然受時代的限制，當時知識青年對於革命的認

識，在思想意識上，還欠缺深刻的理論中心，但因已受到蘇聯革命的影響，所以除了單純的愛國熱情而外，並已有了追求社會革新的理想。因此，他們絕無小我，而萬衆一心，不惜牲犧，貢獻了一切的力量，是爲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爭取民主眞理而努力。

「五四」運動的方向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卅年來，人民革命的戰鬥，總是順着這條大道向前進。直到今天已獲得人民解放的全勝時期，盛大舉行「五四」卅週年紀念，是値得我們歡欣鼓舞的！尤其回想在當時的青年領導者，一直在卅年攸長的歲月裏，能艱苦卓絕，百折不屈的，如毛主席朱總司令和諸位軍政首長們，都以偉大人格，傑出的才智，領導着人民戰鬥到底，竟使革命全面的勝利，即將完成！實使我們對於諸位先進領導的精神，致無限欽佩的敬意！

我們紀念「五四」的光榮，是要記取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今後我們知識分子，更要與工農結合，並團結各界勞動大衆，遵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並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烈士們在各個時期的壯烈犧牲，是使革命的力量更加堅强，

他們從容就義的精神，是給後死者以激勵！現在我們軍事的全勝已成定局，但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尚未除去，所以仍須盡最大的努力！對內必須完全肅清國民黨反動勢力，把革命進行到底！對外更須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統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更爲擁護世界永久的和平，要堅决奮鬥，必須爭取最後的勝利。

回憶與感想

歐陽予倩

「五四」時代的中國青年們，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啓示，舉起反帝反封建的烽火，中國人民醒悟了，帝國主義者震驚失色，於是收買軍閥流氓，屠殺中國青年，分裂中國，要使中國加深殖民地化。孫中山先生所定偉大的三大政策，使北伐得以完成，那時的北洋軍閥們，儘管有帝國主義者極力撐腰，終不免於慘敗。革命軍奠定了中國新生的基礎。

想不到，狼心狗肺的蔣介石，過河拆橋，北伐還沒有澈底勝利，他便開始清黨，接着又來一個十年剿共，無數有爲的青年被慘殺，無數老百姓被戕害。牠更進一步深深與帝國主義者勾結，要想奴化人民以完成其法西斯獨裁的迷夢。

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不記血海深讐，以抗日爲條件，饒了蔣賊的性命，和

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不料抗戰剛一開始，統一戰線就被國民黨的反動分子破壞。不僅共產黨員在各地遭着囚禁和殺戮，就是說幾句公道話，甚至於只在意識上支持統一戰線的也被加以迫害。更不料正當敵人進攻緊急的時候有皖南新四軍事件發生！這是絕難忍受的事。但是，中國共產黨爲着國家，爲着民族，爲着要擊退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帶着滿身上，滿心上的創傷，咬緊牙關忍下了，不曾還手，以至完成了抗戰大業。如果拿中國的舊話講，這不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事蹟嗎？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集團却以爲中共無能，日本剛剛投降，他們一面下令叫敵僞軍隊維持秩序，一面拿政協作幌子，作進攻解放區的準備，及至自以爲準備充分了，便將政協協定撕毁，實行發動大規模的內戰，對老百姓欺壓詐騙，殘殺虜掠，無所不至；對美帝國主義便奴顏婢膝極意周旋，把國家的經濟命脈，海空基地雙手捧出，恨不得把國土人民祖宗三代一齊賣掉以維持小朝廷獨裁的局面。

人民的忍耐是有理性的，所以有限度，全國一致怒吼，摧毁了反動集團的陣

營。中國共產黨掌握着百分之百的勝利，爲着減少人民的犧牲，平心靜氣接受了南京的求和，訂出仁至義盡的協定，又被拒絕，不得已而舉兵渡江。無堅不摧的人民力量當然決非腐敗的反動集團所能抗拒，南京解放了，全中國的解放就在目前，這一來帝國主義者驚惶失措了。英國艦隊之開進長江，只是驚惶失措神智昏亂的一種表示。如果他能仔細考慮一下，決不敢冒大不韙進而干涉中國的內政，那樣露骨地幫助反動集團。帝國主義者始終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在中國人民的面前誰要敢來干涉中國的內政，就會遭到迎頭痛擊，這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個揚眉吐氣的時期。我們應當把這二十年來的豐功偉蹟，寫成輝煌的史詩。

中國的人民站起來了，全中國就要解放了。毛主席說：這還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個召示，使我們感到今後的責任更重。的確，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眞是千頭萬緒。因此每一個都要確定自己的方向，要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裏完成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因此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能有所懷疑。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了，每年紀念「五四」都在特務監視和

威脅之下，甚至還受着迫害與中傷。今年甚麼話都可以暢所欲言了。想一想，何以能暢所欲言？還不是全靠革命人民的艱苦奮鬥嗎？這樣一想，就够令人興奮愉悅，何況有許多偉大的事蹟擺在我們的面前！這是任何人都不應當有絲毫懷疑的。

「五四」感言

聞家駟

今天中國的社會已經在本質上起了巨大的變化，剝削制度與奴役現象已經不能繼續存在了，人與人的關係是要重新加以調整而建立在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新的基礎上面的。只有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面，我們的工作才有意義，我們的權利才能獲得保障。義務必需與權利並重，做到各盡所能，然後才談得上各取所值。個人的利益只能在羣衆的總的利益中去實現，脫離羣衆，便沒有個人，小我必需和大我結合才能得救。

基於上面這種瞭解，我認爲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需要把自己過去的工作重新檢討一下，看看我們的工作是不是有利於人民大衆。如果不是的，我們應該如何改進。如果已經是的，是不是還要加强，使之更符合於人民大衆的利益。以前，

我們是沒有這個問題的，今天由於時代的要求，問題旣然提出了，就得設法解決。徘徊猶豫，不論就個人講還是就整個革命的事業講，那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如果有人想把學術當作堡壘，孤軍困守，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來臨，則更期期以爲不可。

有人認爲我們本來就在爲社會服務，而且成績卓著，久爲社會所重視，這不是已經够了嗎？爲什麼一定要說爲人民服務呢？這種看法，我認爲是似是而非的。因爲今天的問題，不在於服務，而在於爲誰服務，爲什麼社會服務？換句話說，我們服務是爲了個人還是爲了人民大衆？爲了官僚地主階級還是爲了農工兵？服務和服務的對象是不能分開的；二者必需連帶在一起考慮，根據服務對象的本質來決定服務的價值以及服務的意義。服務固然是好事，但也不能把它孤立起來，而籠統地，毫無原則地去予以强調。爲服務而服務之爲虛妄，正與爲藝術而藝術相同，均爲智者所不取也。

請允許我講一段故事：

「春秋時代，有一個名叫微生高的書生，他從來沒有失信於人。一天，他和一位女子相期於橋下。他到那裏去了，可是那個女子沒有去，等到後來潮水沖來了，他還是不肯離開，死死地抱住橋樑，竟被淹死。」

今天我們如果只是强調工作，而不去考慮工作和時代的關係以及如何使工作與實際需要相聯繫的問題，這種對於工作毫無原則的忠實的態度，我覺得和微生高之死守橋樑，並無二致，一旦時代的洪流冲來了，誰能擔保不遭受微生高同樣的命運呢？

世變日亟，時不我予，微生高的故事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唯一的真理

何家槐

在「五四」時候，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起了帶頭的作用，可以說是最先覺悟的運動先鋒，他們的英勇奮鬥，使反帝反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無疑地是很光榮的一頁。可是，「五四」運動並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爲當時革命的根本力量——工農階級還沒有强大，而知識分子與工農羣衆的結合，也還不够密切和鞏固。

「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這個原因。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結合工農民衆，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這一段毛主席論「五四運動」中所說的話，固然適用於全國青年學生和知

識分子，可是，我認爲對於解放區的同學們和朋友們，却更有意義，更應該引爲我們自己的座右銘和學習工作的指南。

我所以要特別强調解放區的緣故，無非是因爲在蔣管區，壓迫之沉重，環境之黑暗，的確使一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容易接近人民，要深入工農羣衆，與之密切聯繫和結合，全心全意地爲他們服務，尤爲困難。國民黨反動派所最顧忌的，也就是這點，不惜用最毒辣的手段來防止，來阻撓，加以各種限制和束縛，屠戮和摧殘（直到最後覆滅的前夕，蔣匪幫還在瘋狂地逮捕和殺害青年）。可是，現在我們已經解放了，不但一切桎梏和威脅，都已一筆勾消，不復存在，而且相反地，隨時隨地都能得到黨政軍當局的指示，鼓勵，和幫助。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只要眞正願意，眞正有決心和工農兵結合，和廣大的人民結合，向他們學習，爲他們服務，那末他的志願一定可以實現，他的決心一定不會落空；怕只怕我們自己沒有決心和勇氣，不能立刻放下舊包袱，放下因襲的重擔，拂去陳腐的灰塵，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各解放區，到處都可聽到缺少幹部的呼聲，很多事情都沒有人做，只好暫時擱置。在新解放區，這種幹部荒的情形尤其嚴重。即在部隊裏面，也有這種現象。據一位在河南軍區政治部工作的同志說，戰士們，在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以後，學習熱情大大的提高，很多士兵都節省僅有的錢購置鋼筆、鉛筆、筆記簿和紙張，學習寫作。在艱苦的行軍中，他們把這些文具保護得特別小心，用洗乾淨的破襪子或油布油紙等包裹起來，放在背囊裏隨身携帶，一有機會，就拿出來應用；其眞誠的學習態度，的確是很令人感動的。可是，指導他們學習的幹部却異常缺少，有時偌大的一個部隊，只有寥寥幾個文藝幹事或敎育幹事，實在應付不過來。對於稍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簡直看成了寶貝，大家搶着要。當然也有少數文藝工作者進部隊去，但他們的目的似乎只限於搜集材料，往往只住一個短時期就走，而且生活和感情，始終不能和一般戰士們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甚至和下級幹部也有合不來的地方，因此，自始至終都只是一個客人和旁觀者的身份，弄得戰鬥越激烈，工作越緊張，而越感孤單，越感寂寞，或發生其他

病態的思想和感情。由此可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投身於解放運動，眞正能够深入工農兵的人還不多，還有待於大家的努力。

現在大軍早已過江，解放了南京，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經打垮，歸於消滅，全國範圍以內的勝利，指日可待；因此我們的責任也特別重大了。所有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特別是在解放區的同學們和朋友們，都應該認清目前的形勢，把握有利的時機，毫不躊躇地深入農村、工廠、和部隊，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與工農兵結合起來，與廣大羣衆結合起來，把我們所有的本領和我們的生命一道，貢獻給這一空前偉大的民主革命。我認爲這樣才無愧於革命知識分子的身份，也才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不致落伍，變成廢料和殘渣。

「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民衆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這實在是一個唯一的眞理。希望每一個知識分子，每一個青年學生，都能够把這話牢牢的記在心頭。

會師

臧克家

把「五四」定為「青年節」是極為恰當的，這是青年們政治意識大覺醒的一天，也是以血肉作代價，給後來的青年運動開創了反帝反封建的一個光榮傳統的一天。但是在蔣管區裏，反動政府却是不敢承認它。硬把「青年節」拉到三月二十九去。因為他怕這個革命的日子，他們本身恰好就是革命的對象——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封建官僚集團。後來「文藝節」也規定在「五四」，記得郭沫若先生在重慶的「文藝節」大會上說過：「我們來接『青年節』的陣地，使我們的文藝永遠年青」。其實，雖是「青年節」沒有被反動政府「批准」，而青年們却忘不了自己的這個日子。每到這一天，總是開會紀念，情勢再不允許，至少也有個晚會：請人講演、朗誦詩、演劇、歌詠，遊藝一番。所請的人，所朗誦的詩，所演

的戲，所唱的歌，全是反動政府所反對，所討厭，所頭痛的。這樣的會本身就既是紀念，又是反抗。記得去年「五四」上海「同濟大學」、「戲劇學校」……的晚會上，演了一齣同學們自己編的活報，劇名叫做「天下為此公」，一個人扮成蔣介石的樣子，滿口阿拉阿拉的念「政協」的協定。後來被特務報告上去，幾乎出了大亂子。

今年在「五四」的策源地來紀念「五四」的三十週年，眞是叫人高興，也太富於歷史意義了。趙家樓的一把火，燃燒起革命的熱情，照亮了革命的道路，三十年來的鬥爭，不屈不撓的精神，眞是像一把火。它鍛鍊出來無數的戰士，也把多少經受不住火鍊的燒化成了灰燼。

北平——這個「帝王之都」，封建勢力的大本營，因為解放而新生了。城頭上高懸着毛主席的畫像，它已經是人民自己的城了。就在紀念這個偉大日子的不久之前，百萬大軍渡過了長江，一大片土地，一個個名城，全被解放了——特別是南京，反動集團的巢穴，也不得不倉皇捨棄，作鳥獸散了。三十年來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快要勝利的完成它的任務，英美帝國主義任它怎樣叫囂，怎樣企圖干涉中國的革命力量，結果如不知難而退，就得自食苦果。今日中國人民的力量雄偉得可以打擊一切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行爲，成爲全世界和平陣線裏有力的一根支柱。反帝反封建，「五四」當年所提出來的口號，經過了將近三十年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已經快要完全實現了。

我們熱烈的紀念這個日子，就是因爲它是在這樣一個形勢之下。「五四」，歡迎呵，你來得眞是時候！「五四」，歡迎呵，正是「八面風雨會北平」！各黨派的民主人士、文化人、作家、藝術家，從各方面匯聚了來，這裏邊就有「五四」當年的前輩。青年們，原處在黑暗區域的，和新從光明地帶來的會師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在戰鬥的「五四」的號召之下，會師了。

在這個偉大的節日裏，我們應該對過去的戰鬥結一筆總賬，看看我們收穫了多少；而最重要的還是檢閱一下自己的隊伍，向着被革命的形勢所充實、所提高了的「五四」精神前進。這個隊伍，現在是更加擴大了，今天意義的「青年運動」，

已經衝破了知識分子的圈子。它衝進了農村，農村青年加入進來了；他衝進了工廠，衝進了部隊，無數的工人、戰士，加入進來了，它的隊伍越長，它的力量和陣容也就越壯大了。

目下革命的大浪潮把許多的知識青年從學校裏冲了出來。滿街都是大學生、中學生、男的、女的，高高興興的走着，便衣上別着一個白符號，他（她）們熱情、興奮、勇敢的那種情緒與心境，我可以用「一九二七」個人跑到武漢去從軍那個感覺印證出來。當然，時代不同了，後來者一定是居上的。

這成千上萬的青年參加到革命的隊伍裏來，是一個好現象，這表示：他（她）們要隨着時代動起來了。我覺得，無論走出學校的，或留在學校的青年同學，能够同來自老解放區的青年幹部會聚，是意義重大的。即便同樣是知識分子，因爲所受到鍛鍊不同，也就顯出强弱來了。在解放區鬥爭過來的，大部已久鍊成鋼，而原在反動政權之下的，雖然也是强硬，但大多數恐怕仍然是塊鐵。身上帶着的一些知識分子的標誌，會在比照之下顯現出來。譬如說吧，反抗運動時代，能够

轟轟烈烈，因爲那是革命的，同時又是浪漫的；今天需要你進農村，下工廠，切切實實，不聲不響螞蟻般的工作了，你也許會覺得死板了，乾燥了。

大家都聽過「戰鬥英雄」、「婦女代表」、「農民代表」們的有聲有色的演講，他（她）不大識字，但是聽他（她）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把這些年青人和學校裏的知識青年一比，差得更遠了。我覺得，應當把他（她）從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幹部和農、工、兵、婦女——當做一面鏡子，照一照自己，把露出的缺點，像點去臉上的斑痣一般下决心除掉它，在舊的死去的地方，新的才能夠生長出來。

紀念「五四」，這個光榮的日子，我們必須用一個嶄新的自我實現這個偉大的傳統所加在我們肩頭上的責任，去給自己，給這個日子增加上一份光榮去。

「五四」哺育了我

王亞平

當「五四」運動波及到各地的時候，我正在故鄉高級小學裏讀書。同學們跟着老師，到大街上遊行，高呼「打倒賣國賊」等口號。使我幼稚的思想裏，第一次感到中國出了賣國賊，帝國主義者欺侮中國人。

不久，我考進了省立師範學校，校長雖說是個老封建，但由於大部分同學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都喜歡訂閱新書、新刋物，對於科學與民主的精神，都有一個新鮮與熱烈的憧憬。

當時的「新青年」、「嚮導」、「現代中國」以及後來魯迅先生等編的「語絲」，都是同學們愛讀的。從這些代表着新思潮的雜誌中，瞭解與初步地認識了新與舊的鬥爭，白話文與文言文的鬥爭，科學與玄學的鬥爭。

年青的學生，最容易受新思想的感染，而且要見諸於行動。同學們組成了文藝研究社、革命劇團，上演了「寶珠小姐」及「農家」，前者是反對封建的壓迫，要求婦女解放；後者是描寫人力車夫的痛苦、受辱打、以及他對統治者的反抗。通過這些新劇的演出，使我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上有壓迫人的，有受壓迫的，受壓迫的要起來反抗壓迫人的。

學校裏來了一位教國文（白話文）及注音字母的新先生，他的名字叫王新邦。穿的很土氣，人很熱情，歡喜和校內進步的同學接近。在他的鼓勵與幫助下，出了一個小刊物——心聲。這個小刊物團結了全校的進步同學，都用白話寫新詩、散文、短論等。它成了同學討論問題、抒發新思想、情感的一個新園地。自己愛好新文藝、學寫新詩是從那時開始的。

隨着同學們思想的進步，對於學校的腐敗，封建的教學、管理，感到極大的不滿，就爆發了一次學潮，貼標語、發宣言，要求把學校革新。結果叫當時的軍閥王承斌把全體同學解散了，那位王新邦老師也走開了，後來聽說給他硬按了

一個赤化帽子，永遠沒有了下落。

回到故鄉，跟着父親學種地，抽空和幾個朋友在村裏辦了一個平民學校，出了一份油印刊物「友聲」，因爲上面有一篇「赤化歟奴化歟」的文章，被封建豪紳誣揑爲「宣傳赤化，蠱惑青年」，兩個朋友被捕入獄，我開始做了流亡者。統治者的殘害與壓迫，我沒有屈服；流浪飢寒的生活，使我仍有決心去戰鬥；主要原因是「五四」的精神深刻地影響了我，它像母親的乳汁一樣哺育了我。當我每感到生活的貧困，環境的惡劣的時候，那種追求新的反抗舊的，永遠不向患難低頭的「五四」影響給我的力量就在我思想裏增强了。記得在「自己的話」一首小詩裏會這樣說「思想像待發的一隻火箭，對準患難去殘酷的猛穿！」

自然，那時的思想、情感，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個人的，和工農大衆相隔十萬八千里。但這一連串的事實，以及在都市裏看到了許多不平的現象、統治者的罪惡，使我對於反帝反封建的認識逐漸明確了，加深了。「九一八」的時候，我正在塘沽，看見由東北開來的難民車，車頂上爬滿了人，過天橋時，一個人突然

站起來；頭碰到鋼鐵的橋樑上，腦漿迸了出來。不久，塘沽車站上有日本兵站崗，在塘沽車站專車上簽訂了賣國協定，大喝香檳酒。這些眼見身觸的事實，使我進一步認識了統治者的嘴臉，帝國主義的可恨。此後，開始有意識地寫些詩，來暴露統治者的罪惡，反抗日帝的壓迫。雖然，寫的很浮淺，但正可以代表那時我的思想從「五四」影響下更向前發展了一步。

以後，在都市裏過了十幾年，也到日帝侵略者大本營的東京讀過書。一方面聽到看到的都是腐敗、黑暗、罪惡，不斷增加着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另一面我接觸了不少的進步者、革命者，在他們的影響、幫助、教育下，慢慢地使我認識學到一點點馬列主義的思想、觀點、方法。——屁股却始終坐在小資產階級那一面的。

直到一九四六年來到解放區，在故鄉一帶的農村裏，和像我父母一樣勞動的農夫、農婦在一起生活、工作、學習，在新的革命的環境裏，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於是，那些愛名位、愛面子、爲個人打算、形式主義、以及文藝創作上的

不正確觀點，才逐漸轉變了、改正了！蹲在小資產階級上面的屁股，也慢慢地移到無產階級這一邊。

如果說我是被「五四」一哺育起來的一個孩子，那末，眞正教育我，培養我，使我得到改造的正是共產黨。今日的北平，將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了一切的建設工作，舊的、腐敗的、黑暗的封建統治勢力永遠地消滅了！新的、民主的、人民的力量要不斷地發揚起來，光大起來！因此，紀念今年的「五四」，將比任何過去的一年更有它偉大而深刻的意義！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

「五四」三十週年述感

潘菽

「五四」運動發源於北平，那時我正在北平讀書。後一年我就離開了北平，一個星期之前我才第一次回到北平。不知不覺已相隔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時間不能說不久，但在整個歷史上講只是短短的一段。在這三十年之間中國歷史已走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中國人民快要完成一個全部大翻身。我來到北平的一天正逢南京解放的捷報傳來，又是「五四」三十週年的前夕，感覺到一種特別的興奮，生平也從未有過這樣的興奮。一種多年所嚮往的東西今天實現了，親眼看到了。一個心愛的城市，在記憶中時時縈念的城市，隔別了三十年又回到了她的懷抱。並且她雖然面目如舊而內心則已不是衰老而是年青。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一個人所感覺到的興奮和歡悅是難於形容的。

但我個人所感到的喜悅和興奮當然並不限於我個人，而是今天全中國大多數人所共同的，我不過是這大多數人中的一個。我們今天大家所感覺到的無限興奮是長夜之後看到晨曦的興奮，是隆冬之後轉入了新春的興奮，是百病纏綿之後恢復了健康的興奮。中國原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中國人民背着一個十分沉重而破舊的歷史包袱，幾乎被壓得寸步難行。到了今天，中國的復興已得到了充分的保證。中國民族已跳出了沉淪的危機而走上了進步的大道。這是歷史上一件無比的大事情，是民族的一樁無比的大喜事。現在全解放區的人民都興奮得要發狂，要沸騰起來，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有人把「五四」運動比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比擬其實是不大切當的。但有一點相同，就是都是一種全面的社會復興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經過了三十年，主要因為共產黨的堅苦奮鬥，已獲得了確定性的成功。但今天的成功還只是初步的，基礎性的。我們還要在這基礎上建立起堅固而華美的大廈。

這是我面對着今年的「五四」所有的一點個人的感想。　五月二日於北平

「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的教訓

沈體蘭

「五四」——這個歷史的日期已經過了三十年了。在這時期中，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已經進步到了人民革命將近全國勝利的前夜。中國青年運動，已經從知識分子新文化啓蒙的階段壯大到了工農階級領導新民主建設的階段。作爲一個親身參加「五四」運動，而且始終和中國青年運動在一起的人，我很想在這個値得紀念的日子，說幾句關於「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的話。

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革命成功，社會主義取得了一國建設的初步勝利。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一度畸形繁榮以後，由於內部的矛盾，爆發了空前的經濟恐慌。在中國，戰後民族資本一度抬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了一線曙光。但由於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破壞統一戰線，以致中國遭受

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這時期，知識分子發動了「五四」運動，提出了科學民主，和反帝反封建的號召。但很快地有革命階級的主力——工人罷工和農民暴動——發展起來，成爲廣大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五四」只是這個時期起首的一個里程碑，可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纔是這個時期民主革命和青年運動的最高潮。

我很幸運的在「五四」以前進了大學。在「五四」時候担任了校內學生會和全城學聯的重要職務。在「五四」以後的一個暑假裏作了一番農村調查和民衆教育的工夫。從那時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始終領導着校內和校際的學運，並且繼續做民衆教育的工作。畢業以後，進了青年會，担任學生工作。有機會得在全國各地旅行，幫助推進青年運動。一九二九至三〇兩年到英國去讀書，順便考察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印度的青年運動。在這十年的經驗中間我得了一個結論：就是青年運動應當和工農大衆結合，否則，就不能完成它現代的任務。

從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一年：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大體完成，進一步組織世界民主和平陣線，來阻止第二次大戰。相反地，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迫使德日

法西斯對內反動獨裁，對外發動侵略。在中國，反動統治依然鎮壓人民愛國運動，招致日帝的不斷進攻。同時，革命勢力經過十年艱苦的鬥爭，團結了廣大的羣衆，取得了堅强的根據地，最後終於逼使反動統治進行了神聖的抗戰。在這時期青年運動在各個崗位上，各個戰線上擴大起來。知識分子繼續發揮優良的傳統。但工農大衆更廣泛地、更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行動，形成了主動和決定的力量。一九三五的「一二、九」是這個時期一個里程碑，可是一九三七——三八年的統一戰線乃是這個時期民主革命和青年運動的最高潮。

我回國以後不久，就做了上海一個中學的校長。在校內努力建設一個民主教育的園地，積極贊助學生運動；在校外參加各種愛國活動，尤其担任上海聯（上海基督教學生團體聯合會）的顧問。這個團體在堅持學運統一戰線和發揮學運先鋒作用上，是有它光輝的歷史的，同時，我們的學校又辦了好幾年工人教育——有一所民衆學校和四所分校。抗戰爆發後我又擔任了學生救濟委員會的主席，鼓勵學生從事農村和工廠的各種服務工作。在這十年的經驗中，我又得了一個結論：

就是青年運動應當以工農階級爲主體，服務於工農利益的民主統一戰線。

從一九四一年到現在：世界又經過了第二次大戰，社會主義的蘇聯更穩固，更强大了。東歐又產生了許多新民主國家，與蘇聯形成了民主和平陣線。相反地，以美國爲首的獨佔資本，爲了擴展世界霸權，避免經濟恐慌，正在復興法西斯勢力，製造第三次大戰。同時，在中國，美帝支持下的反動統治已經將近全部崩潰，人民解放戰爭快要得到全國的勝利。在這時期，青年運動有了更輝煌的成就；它在工農階級自己的政黨領導下，以土地改革動員了農村青年，以發展生產號召了職工青年，並且在解放戰爭旗幟之下，團結各階層許多青年，獻身于革命工作。在這時期內，青年運動配合着人民革命的發展又有了好幾個大大小小的里程碑，說不定要以大軍渡江，解放京滬算爲它的最高潮罷！

我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有二三年担任了一個內遷大學的代理校長。後來又到大後方担任另一個大學的秘書長和生活輔導委員會主席。勝利復員後又担任上海一個大學的敎授。在這許多年中間，有很多機會和同學們共同生活，從旁幫助靑

年運動——尤其是在成都的那個大學裏，最爲愉快。那裏，我又兼當地學生救濟委員會的主席，更接觸了、援助了許多有爲的青年。回上海以後又和一些朋友組織了各大學教授聯誼會，更有機會與上海學聯、全國學聯等負責人時常來往。最後，我終於到了解放區，開始享有與各階層民主青年廣泛接觸的權利，並且參加籌備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工作。在這十年中我更得了一個結論：就是青年運動已走上了一個嶄新的途程，必須加緊學習，努力生產，以推進新民主革命的建設事業。

願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成功！願中國青年運動更進一步完成它歷史的任務！

「五四」卅週年紀念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寫給中國和世界科學工作者的公開信

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一千二百個會員們，今天以無比的興奮和同業者的親切感情，向中國和世界的一切科學工作者陳述下面的意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後，久經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內外雙重壓迫的中國人民和他的知識先鋒隊，爆發了一次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那一次帝國主義者之間互相火併的戰爭，暴露了帝國主義無法掩飾的墮落而罪惡的本質，結果逼使趨向沉淪的地球的廣大一角上，聳出了偉大的列寧和蘇聯的英勇人民所創造的劃斷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時，在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威爾遜總統向那一次的戰後分贓性的戰勝國和會裏提出了十

四條原則・其中之一是全世界各民族的自決權利・但結果這提議却遭受了失敗。這兩件事情深深地教育了當時的中國知識青年，使他們醒悟到現代中國積弱的原因之中，除去國際帝國主義的長期壓迫之外，是缺少了國內政治的民主制度和精神，與科學研究培植的不足。也正在這個時候，巴黎和會中帝國主義諸强國誘迫中國代表簽訂出賣山東省主權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條約。這消息傳到了當時中國政治首都的北平，激怒了全市的大學生青年和一部分有政治覺悟的市民，於是就舉行了一次警告當時正在進行獻媚日本帝國主義的外交部長和中國駐日公使的示威運動，打傷了其中之一人，毀壞了其中之一的住宅。結果經歷了一個月的全國各大都市學生工人和一般市民的聲援，當時的政府屈服於這一場正義的愛國行爲，不僅不敢向學生問罪，而且能免了當時被打擊的三個重要高級官吏，命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了對日本屈辱的條約的簽字。

這一場運動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替後來的中國民主政治和科學培植啓示了一條發展的道路。人民的民主要求和科學研究的追索，在不同

程度的曲折上，都有了逐時的進展。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場運動以後的兩年創立，更替這一個民主與科學的要求，在萬分艱難與困苦的條件下，加添了充實的內容與確切的保證。天才的新民主主義的創造，就在這萬分艱難與困苦裏誕生。

今天，這個「五四」的節日到了它的第三十週年，中國人民的力量在新民主主義原則的領導之下，取得了廣大深遠的勝利，爲民主與科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反動的障礙，爲穩定世界和平的大業提出了有力的保障，爲中國和全世界的科學工作者之間的合作增進了兄弟般攜手同行的展望。我們的興奮與發展科學事業的信心是不難想像的。尤其是正在中國人民的力量取得了這個產生「五四」運動的發祥地的管理權以後，中國社會改造的重心轉爲以城市領導農村，自有歷史以來存在着的城鄉矛盾與隔閡已經消除，今後中國對於工業與科學需要的迫切，是全國人民工作日程上的第一件實踐問題，而決不是封建軍閥官僚統治和聽任帝國主義壓迫的舊時代的紙上空談了。

我們並不諱言，在這過去三十年的時間歷程中，中國的科學工作者，由於

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的不同，也由於他們已經有了追求民主與科學雙重要求的傳統，他們比起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科學工作者來，實在是更容易理解得到科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更容易體會得出科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雖然他們的力量倒是比較薄弱的　在過去三十年的經驗中，中國科學的研究，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之下，也還有了它的一度發展；尤其是地域性科學如地質學、生物學和氣象學等等，也收到了一部分的成就。但是，也就是這個經驗，證明了蔣介石所代表的統治力量決不配担當發展中國的工業和科學的責任。且不說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長期苦戰中，這個統治力量寧可放縱貪汚腐化的惡德橫行中國，削弱了中國的健康力量的發育，舊有的微弱的科學事業的成果，聽任它衰萎難振。這是舉世共見的事情，而蔣介石統治集團却是只肯無賴地推諉給條件艱難，就以爲可以交代得了他們的責任。我們試舉其他的兩件事例說明我們的意思：一件是蔣介石的特務早在一九三一年就殺死了當時襄助蔡元培先生主持中國最重要的科學研究機關的有能力的機械工程學家楊杏佛先生，理由只爲了楊先生曾經參與了保障人

權的運動。那個時候還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盛讚蔣介石的「政績」的時期，而楊先生則是一位對美國頗有感情，又是創建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之一，而且是多年推動科學事業的人才。另一件事是創辦中國化學工業與主持中國工業化學研究最著有卓絕的成就的范旭東先生事業的受到阻撓：他以畢生三十年的努力，不乞求腐敗政府力量的幫助，在曲折的道路上創立並發展他的事業，贏得了國內與國際的交口稱譽。抗日戰爭將告勝利前夕，他遠去美國，向那裏的進出口銀行以獨立自主的立場，商借到一千六百萬美元的借款作爲恢復並擴展他的事業的資金。結果這件事却受到蔣介石政府的阻撓：理由是這個政府寧願接受美國壟斷資本家的計劃，聽任他們的剩餘的化學工廠移到中國來迫害中國的民族工業。結果范先生爲此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鬱死於重慶。這兩件具體事例足够從科學事業的立場上說明蔣介石政權的反動倒退的性質，不惜與科學爲敵；自然更不必說它如何出賣國家主權，出賣人民利益，聽任美國壟斷資本家集團的操縱，與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爲敵了。

中國科學工作者非常激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有正義感的科學工作者的普遍覺醒，理解到自身的社會責任，加强同業人的組織與團結，拒絕參加科學爲少數人利益服務與人民爲敵的一切企圖，在世界和平與人民發展遭受新的威脅的今天，更不斷的發出他們的抗議與力量。這說明了人民時代的躍進，科學工作者自覺地加進一份力量，必能對於扭轉帝國主義者殘暴狂縱的逆流，穩定世界和平，增强全世界人民兄弟的友誼的偉大理想與目標上，盡到有效的貢獻。我們應當向蘇聯的科學工作者樹立的工作榜樣看齊，集體地、有計劃地、諧和地善盡自己的力量，毋負歷史交給我們這一代科學工作者的責任。

我們特借今天這對於中國科學工作者特別有紀念意義的節日，向全國和全世界的科學工作者申述如上的願望和信心。

全世界進步的科學工作者加强團結起來，爲了消滅帝國主義危害全人類歷史進程的罪行而奮鬥！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北平

「五四」運動介紹

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即北平）地方的「五四」運動，到現在已三十週年了。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開端的節日，是中國革命青年運動的節日，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節日。

「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與中國人民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因爲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空前地暴露了它的醜惡，並且開始了它的崩潰，使中國人民開始在政治上脫離帝國主義世界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德奧意等國的革命運動，給中國人民以偉大的新的希望。這個歷史背景，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也劃分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兩個時期。如毛澤東同

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爲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則是這個歷史變化的一個關鍵。

「五四」運動是這樣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俄、美帝國主義集團，對德國帝國主義宣戰，乘機奪取它在中國掠得的特權。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對德國宣戰後不到三個月，日本帝國主義就控制了整個山東省。但它並不以此爲滿足，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又向袁世凱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條約。當時想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當中國皇帝的袁世凱，喪心病狂地派了北京政府的交通總長、親日派首領之一曹汝霖於五月九日在這個亡國條約上簽了字。德國失敗後，一九一九年一月，戰勝的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政府在

巴黎召開分贓的「和平大會」，在大戰結束前一年參加戰爭的北京政府也派了代表參加會議。在中國人民的壓力之下，北京政府代表在會議上提出收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權利和廢除二十一條條約的要求。但是由於美、英、法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以及北京政府的媚外賣國政策，「和會」拒絕了中國的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劃歸了日本，對廢除二十一條條約，則藉口不在會議討論範圍之內，也完全予以拒絕。

巴黎和會的消息傳至中國後，全國人民激憤異常，北京青年學生首先燃起了反侵略、反賣國運動的火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數千學生聚集天安門向北京政府舉行了巨大的示威，高呼「收回山東！」「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等口號。但北京政府不僅拒絕了愛國青年學生的正義要求，並派大批軍警出動鎮壓。這更激怒了示威的羣衆。學生們便湧向東城趙家樓，焚燒曹汝霖的住宅，並痛打北京政府幣制局長陸宗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等著名賣國賊。在北京政府大批逮捕學生的高壓下，學生又更進一步的發動了罷課，並於六月三日展開了

大規模的街頭宣傳，運動蓬勃的發展起來。

北京青年學生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的英勇鬥爭立即得到了全國學生的熱烈響應，工人和市民也相繼捲入了這個浪潮。上海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唐山、長辛店鐵路工人舉行遊行示威。南京、杭州、天津、保定、濟南、武漢、長沙、廈門以及東三省等地的學生工人和市民都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在全國造成了如火如荼的羣衆運動。在廣大人民的强大壓力下，北京政府終於被迫讓步，釋放了被捕的學生，撤消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的職務，並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這一運動帶着爲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革命性，這就是澈底地不妥協地和羣衆性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因爲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已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有了成長，而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則「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

當時中國已經產生了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在「五四」運動中，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結成統一戰線，担任了這個運動的領導。這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的結合，當時雖然還僅僅是開始，却就使「五四」運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面目。「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時，還局限於知識分子的範圍內，沒有工人、農民參加。發展到了「六三」運動時，有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參加，才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是使中國革命從此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它與全世界風起雲湧的無產階級革命聯系在一起，並成為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使中國人民迅速革命化，在思想上、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所開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在正在取得全國範圍的勝利。

「五四」運動在中國青年運動中的歷史地位，使「五四」被定為中國青年節。「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青年繼承着「五四」運動的革命精神，一貫站在

革命的前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一九二〇年中國革命青年就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青年都積極參加了革命的鬥爭。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青年運動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和三年來的人民解放戰爭中，青年無論在前線或後方，解放區或國民黨統治區，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青年運動進入了空前的全國大高潮。中國青年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無疑將作更偉大的貢獻。

「五四」運動又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以前，以「新青年」雜誌爲中心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即向舊道德、舊文學、封建迷信思想展開進攻，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學、提倡白話文和平民文學。以李大釗爲代表的運動中的左翼，並開始宣傳鼓吹馬克思、列寧主義，把共產主義的思想傳播到中國來，使文化戰線上的鬥爭走上新時期。在「五四」以前，所有學校與科學之爭，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等等，都只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與封建主義的舊文化之爭。「五四」以後，文化戰線上的鬥爭就成爲了歷史唯

物論和辯證唯物論所領導的人民民主的新文化與唯心論和形式主義的封建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以胡適爲代表的原來運動中的右翼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後來投到了反革命的文化陣營中去，或者退出了戰鬥，消聲匿跡。但是日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鬥爭經驗武裝起來的革命陣營迅速壯大，以所向無敵之勢，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在文學藝術領域中，都取得偉大的勝利。

但是像政治方面一樣，「五四」文化革命運動的弱點是沒有能普及到廣大的工人、農民羣衆中去，因此，「五四」和「五四」以後的革命文化的根基還是薄弱的。在反革命統治之下，中國革命文化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還不足以完全擊敗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並取而代之。只有在中國人民解放區，這個建立完全嶄新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任務才得到實現。在解放區，不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文化運動在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方面上作了重大的努力。特別是經過毛澤東同志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經過延安文

藝界座談會和整風運動後，糾正了錯誤的偏向；確立了鮮明的方針，更使解放區的新文化在幾年來獲得了蓬勃的發展。現在，在勝利的中國革命的形勢下，這種人民民主的文化正排除一切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而佔領着文化領域中的全面陣地。